



21st CENTURY
CORPORATE CITIZENS FORUM
平衡，可持续



中国乡村 振兴之路 白皮书 (2021)

White Paper
on the Road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2021)

目录

第一章 乡村振兴将成 CSR 主阵地	01
第二章 乡村振兴政策解读	04
第三章 新蓝海	11
第四章 专家访谈	14
1. 温铁军	15
2. 刘守英	18
3. 邓国胜	19
4. 刘文奎	22
5. 陆波	25
第五章 乡村振兴优秀案例	29
1. 综合案例	30
2. 产业振兴类	34
3. 科技扶贫类	43
4. 金融扶贫类	51
5. 健康扶贫类	57
6. 人才振兴类	62
7. 生态振兴类	65
第六章 乡村振兴企业投入情况统计	71

第一章

乡村振兴将成 CSR 主阵地

大幕开启， 乡村振兴将成 CSR 主阵地

在脱贫攻坚战于 2020 年底如期取得重大胜利之后，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开始转向乡村振兴。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动共同富裕作出过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国家领导人今年曾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按照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我们要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全社会要努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现实意义

2021 年，乡村振兴成为一个大众传播频率极高的热门词汇。乡村振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我们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密切相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主要内容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0 年脱贫攻坚战的重大胜利，意味着我国顺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着手去完成第二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要完成这个目标，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乡村发展。

虽然经过多年的脱贫攻坚战，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的问题仍然存在，尤其表现在城乡差距明显。尽管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城乡差距仍然很大。2017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432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6396 元，差距明显。

发达国家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城乡之间基本没有生活质量上的差距。比如在日本，农民的年收入甚至比城镇居民还高一些；欧美国家的农民，其生活状况也非常优越。

相比而言，我国农村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比如，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很不足，如文化、教育、医疗等；农村的人居环境也不好，大多数村落都缺乏规划，显得脏乱差；此外，农村还残存着不少落后的观念和陋习，也严重阻碍着农村的发展。

如果到 2050 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我国的城乡面貌就不能有大的差别。这意味着，我国的广大乡村必须要在今后 30 年不到的时间之内有巨大的发展，乡村面貌要有巨大的改观。因此，乡村振兴是当下的重大国策，事关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强国建设。在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后我们随即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非常必要的，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的两大关键要素

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的任务更为重大，目标也更为宏远。乡村振兴有五个方面的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中央同时也提出，乡村振兴要实现五大振兴，即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以上五个方面的要求和五大振兴，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只有各方面齐头并进，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振

兴的总体目标。不过，其中最为关键的要数产业和人才。如果解决好了这两个关键要素，其他几方面的振兴将会水到渠成。

实现乡村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但就目前而言，乡村的产业发展效率不高，竞争力不强，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资源缺乏、发展规划滞后、发展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我国的乡村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很小，主要还是农业，而农业的生产方式还是以传统的单家独户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为主，生产成本高，投入产出比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产业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技术、资金、信息、市场、渠道、管理等多种资源要素的投入，而这些资源要素在乡村还很缺乏，严重制约着我国乡村产业的发展；脱贫攻坚曾极大地促进了一些乡村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形成了符合当地特色的产业体系。但是，大部分此类产业体系都是在政府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存在着与市场对接不紧密，甚至是脱离市场需求的现象。未来，我们需要将这些产业推向市场，建立起基于市场需求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

乡村振兴需要有优秀的人才，如果不能吸引到人才，乡村振兴将无从谈起。乡村需要的是既有知识和能力，又有意愿在乡村生活工作干事业的人才。在行政安排或情感感召之下，一些优秀的人才有可能会来到乡村，但他们能在乡村工作、生活多长时间就很难说了。所以，乡村必须要对优秀的人才才有吸引力，使他们乐于前往并长期生活居住。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大部分乡村恐怕都不具备这样的吸引力，这是乡村发展面临的一个极大的不利因素。

吸引人才需要有多方面的条件，比如说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这些难以在短期内有较大的改观；但是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在工资、税收、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向有意愿去乡村创业发展的人才倾斜，从而弥补乡村其他方面吸引力的不足。

乡村振兴——CSR 的下一个风口

过去多年，在国家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之下，精

准扶贫一直是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领域。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资源优势，踊跃投入到精准扶贫大业之中。它们或者独立推动，或者与 NGO 组织合作，发起了形式多样，颇具创意的扶贫公益项目，试图通过商业的方式来助力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摸索出了很多切实有效的扶贫模式，如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电商扶贫、生态扶贫等。

可以肯定，在未来的乡村振兴过程中，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仍将举足轻重。乡村振兴会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阵地，会成为 CSR（企业社会责任）的下一个风口。而与精准扶贫相比，乡村振兴为企业的 CSR 实践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前文所提到的乡村产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乡村如何吸引和培养优秀的人才，这些问题纷繁复杂，都是从精准扶贫过渡到乡村振兴之后不容回避的议题，也是企业今后参与乡村振兴时要去“啃”的硬骨头。虽然挑战巨大，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只要企业能发挥专长，找准切入点，搞好跨界合作，再复杂的难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我们也要看到，乡村振兴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已经有了些可贵的尝试和经验积累。在过去企业发起的众多扶贫公益项目中，有一些项目并不仅仅只是着眼于扶贫，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立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符合乡村振兴的要求。比如说华润集团发起的“华润希望小镇”项目，集产业帮扶、环境改善、治理提升于一体，意在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宜业的乡村小镇。该项目已经连续运营 10 多年，在全国各地建设了 10 多个华润希望小镇，成果丰硕。

类似这样的项目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这显示了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远见和创新能力。而刚刚拉开序幕的乡村振兴大舞台，又为中国企业开展 CSR 实践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企业的持续参与，我国的乡村发展将面貌日新，乡村振兴的宏大目标将会顺利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长为有责任担当、能力卓越的优秀企业公民。

第二章

乡村振兴政策解读

乡村振兴重大政策解读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月25日，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202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提出重点工作。

以下对上述三个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做解读。

1.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规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谋划，分别明确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2年召开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

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是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据。

贯彻实施好《规划》，对于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矛盾，保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基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五大要求	具体内容
产业兴旺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坚持质量兴农、品牌强农，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生态宜居	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遵循，促进乡村生态宜居。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乡风文明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促进乡村乡风文明。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治理有效	以构建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为重点，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生活富裕	以确保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促进乡村生活富裕。加快补齐农村民生短板，让农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2021年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文件聚焦新发展阶段的“三农”工作，将对于全面脱贫攻坚战之后的农村发展制定新的任务和目标。

《意见》对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农业农村短板弱项问题，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等方面提出了规划和远景前瞻。2021年《意见》指出，将完成以下目标任务：

2021年目标任务	要求
农村改革目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启动实施
	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平稳过渡
	农村改革重点任务深入推进
产业扶持目标	生猪产业平稳发展
	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
	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1.3万亿斤以上
农村环境目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农村收入目标	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除此之外，《意见》还确定了乡村振兴的基础发展、乡村绿色转型等方面，具体远景目标如2035年目标，重点集中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下：

2021年目标任务	要求
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农村生活设施便利化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
农业基础更加稳固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更加有力，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明显优化，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升，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	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减少，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乡村建设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发展活力充分激发，乡村文明程度得到新提升，农村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高。

3.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202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文件指出，未来15年将通过6大方面共24项措施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计划到2035年，脱贫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农村低收入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在促进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文件明确，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设立5年过渡期，做好过渡期内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有效衔接。

综合来说，文件中的规划方面主要分为政策规划和产业规划，政策规划中主要指出了乡村振兴未来相关帮扶政策制定的方向和重点，产业规划中主要阐明了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	相关要求
政策规划	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
	巩固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完善后续扶持政策体系
产业规划	推动特色种养业等乡村产业发展
	完善全产业链支持措施
	支持农产品流通企业、电商、批发市场与区域特色产业精准对接
	搭建用工信息平台、培育区域劳务品牌
	以工代赈、稳定就业

乡村振兴区域政策及措施汇编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实施策略和措施，为乡村振兴战略在本地的推进实施明确了思路，提供了路线图和指引。

下文汇编了若干个省市的乡村振兴政策措施，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实施，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各地的全面顺利推进。

1. 河南省：制定未来五年乡村振兴路线图

2021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文件，分别从产业、人才、生态、文化和组织建设五个方面划定未来五年河南省乡村振兴的“路线图”。

产业振兴——初步建成新时期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

到2025年，粮食产能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初步建成新时期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十大优势特色农业产值达6500亿元以上，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5%左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7%左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万元以上、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部分产业基础较好的县（市、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人才振兴——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取得重大突破，乡村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使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注入“源头活水”。

生态振兴——要走在黄河流域前列

到2025年，乡村生态振兴走在黄河流域前列，农

业绿色发展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功能稳步提升。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新增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村庄6000个，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率达4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45%，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5%以上；完成国土绿化造林754万亩、森林抚育1920万亩、退化林修复267万亩，湿地保护率达53.21%，森林覆盖率达26%。

文化振兴——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主体

到2025年，力争全省具备条件的镇村都成立“乡村文化合作社”，县级以上文明村镇达60%，建成1000个以上乡村旅游示范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主体，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乡村文化振兴走在全国前列。

组织振兴——乡村党组织组织力全面增强

《河南省乡村组织振兴五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年年底，乡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全面增强，创建五好乡镇党委达50%以上，基层党建示范村达60%以上，“四有四带”村党组织书记达80%以上，全省所有行政村都有集体经营收入，其中年经营收入超过5万元的达80%以上。

2. 河北省：15项政策措施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2021年，河北省乡村振兴局、省农业农村厅等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实施

意见》。实施意见提出，统筹整合各方资源，通过15项政策措施集中支持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实施意见指出，将原 62 个贫困县全部确定为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作为“十四五”期间防止返贫致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地区，给予集中支持，增强其区域发展能力。2021 年—2023 年，对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中原 45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延续执行整合试点政策，原则上纳入整合范围的中央和省级财政涉农资金（含提前下达资金）当年安排的资金县均投入规模不低于其他县的县均投入规模。

实施意见强调，2020 年及以前发放的扶贫再贷款可按规定展期，现有的再贷款帮扶政策在展期期间保持不变。在优先保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内搬迁农户安置用地和农村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建设用地，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可以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逐步调整优化生态护林员政策，优先吸纳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和防贫监测对象实现就业，力争生态护林员每年稳定在 5 万人左右。

3. 天津市：立法加速推进乡村振兴

2021 年 9 月 27 日，天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并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天津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天津市实施了五大振兴推动方案以及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现代都市型农业升级发展效果显著，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乡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有效改善，乡村治理现代化扎实推进，垃圾、污水、厕所等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得到治理和解决，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而制定《条例》，就是把把这些政策措施和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安排，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条例》根据天津市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定位和“大城市、小农村”特点，对乡村振兴促进法原则规定进行细化和补充，形成国家法律、地方法规上下衔接配套的法律体系，为依法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完备的法治保障。

在壮大乡村产业方面，《条例》明确构建现代都市型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依托乡村优势特色资源，发展现代种植业、现代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休闲旅游业等产业。同时，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家庭农场，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全产业链经营。此外，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明确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支持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同时，《条例》强调突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首先是加强乡村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开展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加强绿色生态屏障管控地区的建设、保护和管理，发展节水型农业，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同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和农村全域清洁化工程，建立健全政府、村级组织、企业、农民等各方面参与的共建共管共享机制。此外，鼓励和引导农民采用新型建造技术和绿色建材，建设功能现代、结构安全、成本经济、绿色环保的宜居住房。

4. 四川省：为乡村振兴战略出台分类考评激励办法

2021 年 10 月 12 日，《四川省县（市、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类考评激励办法》正式印发。

根据《办法》，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开展乡村振兴先进县（市、区）、先进乡镇和示范村考评激励的同时，

新设置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县（市、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县（市、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村考评激励。

《办法》适用于全省 176 个涉农县（市、区），及

所辖乡镇、行政村，所有176个涉农县（市、区）将分乡村振兴先进县（市、区）、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县（市、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县（市、区）三大类进行考核。

《办法》明确，全省所有涉农县（市、区）所辖乡镇统一纳入乡村振兴先进乡镇考评；全省涉农县（市、区）行政村则分乡村振兴示范村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村两大类进行考核。四川省将每年考评乡村振兴先进县（市、区）10个、成效显著县（市、区）15个、重点帮扶优秀县（市、区）10个、乡村振兴先进乡镇50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500个、重点帮扶优秀村200个，并给予正向激励的“真金白银”。

其中，乡村振兴先进县（市、区）将一次性给予6000万元财政资金补助；成效显著县（市、区）将一次性给予4000万元财政资金补助；重点帮扶优秀县将一次性给予4000万元财政资金补助；乡村振兴先进乡镇将一次性给予500万元财政资金补助；乡村振兴示范村一次性给予60万元财政资金补助；重点帮扶优秀村一次性给予60万元财政资金补助。

5、广东省：未建立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在乡村振兴考核中一律不能评优

2021年11月，广东省举行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座谈会，对广东省“十四五”时期及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再研究、再部署、再推动。

会议指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分类科学规划。一是要切实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不能重表轻里，不能搞虚假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等无效实施，更不能不作为、虚报数据、编造案例；二是要切实解决政府干、农民看的问题。在财政资金使用上，要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方式支出；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长效管护上，要探索农户合理付费机制；三是要切实解决系统规划不好的问题。要坚持规划先行、有序建设、逐步提升；四是要切实解决照抄照搬城市建设模式的问题；五是要切实解决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做到设施与运维管护一体谋划、一体设计、一体建设；六是要切实解决重典型示范、轻全面推进的问题。

会议要求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市要成立市委副书记或市委常委担任组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领导小组，有力推进工作落

实；二要建立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各级财政要持续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投入，保障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运维、管护等经费。同时，要引导企业、社会团体、乡贤等，通过“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6·30”活动支持乡村建设；三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确实做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到哪里，长效管护机制就覆盖到哪里，做到管护有制度、有经费、有人员、有监督。

会议提出，从2021年开始，没有建立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的县（市、区）在乡村振兴考核中一律不能评优。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是广东省乡村振兴考核的主要内容，省乡村振兴局将充分发挥好考核指挥棒的作用，按照“季度通报、半年督查、年度考核”，定期评估督查各地各部门工作情况。省已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日常监督工作机制，每季度委托第三方对21个地市各抽取1个县（市、区）进行暗访，掌握基层真实情况，日常监督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各地要同步建立乡村振兴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绩考核和日常监督机制。

第三章

新蓝海

新蓝海 ——极具增长潜力的乡村市场

2021年11月17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到2025年，我国将形成以农产品加工业为“干”贯通产加销、以乡村休闲旅游业为“径”融合农文旅、以新农村电商为“网”对接科工贸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增值收益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意见提到的发展目标显示，到2025年，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8:1，加工转化率达到80%；乡村休闲旅游年接待游客人数40亿人次，年营业收入1.2万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1万亿元，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达到1万亿元。

农村产业空间巨大

的确，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提高，社会对农产品，特别是对较高质量农产品有旺盛的需求。我国的GDP约有一半来自消费，而消费中占最大比重的就是食品消费。中国的食品消费每年高达10多万亿元，由于食品的生产 and 供应现在不可能脱离农民和土地，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主要是由农村产业提供。

而且，目前的国内食品需求中，有一部分是依赖进口，由于远程运输不利于保鲜，而新冠疫情从国外冷链输入的事实也在提醒我们，这种方式存在安全隐患，因此，超长远程冷冻储存的食品供应模式未来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人们会转而寻求更靠近消费地、更容易保鲜的食品来源，这种方式也更符合低碳绿色发展的理念。这样的转变也会扩展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

农村过去发展不好，是因为为别人提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不够，所以就相对贫困。乡村发展最根本的出路，是要能通过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获得财富。农业虽是传统行业，但并不意味着农业与高新技

术毫无关联。高新技术可以在乡村找到很多应用场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农业发展一定会更加高效，呈现出新的面貌。

相比之下，大城市周围的农村更有机会形成高效农业。中国有700多个城市，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重要都市圈，围绕这些都市圈，乡村产业的发展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乡村消费——未来的10万亿级市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7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925亿元，同比增长8.5%，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8%，乡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乡村市场恢复自2021年3月开始明显改善。2021年第二季度，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3%。

近年来，我国的乡村消费市场加速崛起。乡村消费由于基数小、增速快，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11%。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9.2万亿元，其中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3万亿元，占比约为13.52%，很有增长潜力。近年来，乡村消费保持强劲增长动能，增速连续8年快于城镇。

另外，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等因素，也为乡村消费的进一步增长奠定了基础。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比上年增长3.8%，快于城镇居民2.6%。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快速增长，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

在当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农民消费潜力得到释放，

农村将逐渐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

7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了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的措施，以更好地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会议指出，加快发展农村寄递物流，进一步便利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是推进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释放农村内需潜力的重要举措。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明确，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

多重利好下，我国乡村消费市场有望保持较高增

速。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消费》绿皮书指出，近年来，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直在11%左右。2020年疫情影响下，这一数据同比下降3.2%，同期全国社零总额为下降3.9%。考虑到我国疫情得到较好控制，农村消费水平恢复较快，未来10年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年均7%左右增速是有可能的。据估算，2030年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在2020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有望达到105724亿元。

第四章

专家访谈

温铁军：知名“三农”问题专家

乡村振兴是应对内忧外患的压舱石

作为政策官员出身的学者，温铁军青年时期下乡为知青，经历过工、农、商、学、兵，后来考入人大新闻系，学生时代就有国际视野，之后历经解放军总政治部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人大农发院院长等职直至退休。

温铁军以在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而声名远扬，他是一个对农民获得公平待遇抱有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对激进现代化持警惕态度的学者。9月12日，温铁军在北京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专访，作为长期做政策研究的学者，他的思考已经成为了国家政策，他如何看待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任由贫富差别拉大可能造成社会撕裂

《慧见》：你是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新世纪之初三农问题就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你如何看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温铁军：其实说我是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不太合适，我不外乎就是把上世纪90年代那种比较偏重于农业生产的政策讨论，增加了两个维度：认为应该强调农民利益维护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比较高的国家，如果不讲农村发展只讲农业生产，政策是有偏差的。

党的十九大确立乡村振兴是国家还需20年才能完成的重大战略。根据小平同志的说法，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鼓励部分人先富；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最终造成的是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小平同志40年前就定了这个目标，在2000年进入新世纪之前要实现全面小康，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带动农村百业兴旺，也确实展现出共同富裕的前

景；只不过因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要应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同期乡镇企业大面积歇业与国企改革带来的一部分劳动群体收入下降，使整个上世纪90年代用财政做二次分配的方式来缓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能力严重不足，虽然1993年确立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缺乏财力就做不到。

现阶段再度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党的历史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恐怕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如果不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任由贫富差别拉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撕裂，拿什么应对严峻的全球化挑战？

《慧见》：你所指的全球化挑战是疫情以来这种逆全球化趋势吗？

温铁军：其实不是。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充满挑战的，为什么现在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近这两届政府都在大规模地制造流动性过剩，向全球转嫁美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泡沫崩溃的代价。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越多进口、越多为世界生产，就越多吃进通胀，简单说叫输入型通胀，有谁愿意继续这样吃人家的代价吗？这是全球化挑战的第一大问题。

接着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了，那些靠着价格飞涨受益的国家已经把收益都花掉了，当价格陡然降下来，比如石油价格从148美元又降回到30美元的时候，这些得了原材料涨价好处的国家突然没好处了，消费突然萎缩，就导致全球通缩。

从全球通胀到全球通缩，客观上是那个所谓主导全球化的国家一手造成的，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个吃进代价的方式走吗？为什么我们要调整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因为一会儿全球通胀，一会儿全球通缩，进口通胀和进口通缩对我国来说都是承担了美欧日连续出台量化宽松的成本转嫁。加之近年

来全球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连续进攻，即使我们想走老路，人家也不让了。

所以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挑战不仅仅是全球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破坏，实际上疫情之前已经有10年左右时间，我国一直面临着大起大落变化无常的全球化成本转嫁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慧见》：农民其实是弱势群体，你出身书香门第，大学毕业就先后进入了总政治部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什么让你注意到被转嫁了成本的弱势群体？

温铁军：我们那一代人都经历了基层的锻炼，老三届都有十几年在基层的工农兵生活，高考恢复上大学的“新三届”在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机关要更新换代，需要人，于是，这些有过基层实践的人就参与了国家政策研究，就会比较贴近底层。

三农是党一直以来的政策，但特别关注三农就是那个阶段开始的，以农民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以农村的发展作为政策主要考虑的目标。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主要方向。到上世纪90年代，主管部门开始比较倾向于把美国那套教科书理论体系搬过来，有人就爱说美国农民如何，其实概念错了，应该是说美国农场主如何，然后把西方那一套农业现代化当做赶超目标。这种情况下我才不得不斗胆多提了几句质疑，请注意美国农场主和中国农民，这种基本概念的内涵不同，也许应该归因于翻译有误。

三农问题亟待制度体系破题

《慧见》：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三农问题的文章中总结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你觉得现在这两个基本矛盾还存在吗？

温铁军：两个基本矛盾应该说有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基本国情矛盾是“人地高度紧张”，还没有根本扭转，所以才大量进口外国的能源、原材料、粮食、饲料等等属于“土地密集型”的资源 and 农产品，我们现在进口的农产品折抵中国的耕地总量已经占到了

30%以上。

第二个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已经有很程度的缓解。从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到2017年确立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各部门已经向农村投资了几百万亿的设施性资产；因为，农民无力自主形成资本投资能力，农业无力完成资本积累，只好由政府投资来完成，这就已经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乡村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但我们在原来二元结构体制下形成的全部制度、法律、政策乃至政策操作的部门都还没改。

《慧见》：你觉得制度层面未来可能最先破题的会是哪里？

温铁军：我在1988年《土地管理法》出台之际就提出应以城乡土地“同权同利”为原则，现在看有所改进。首先改的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但外部开发必须保留50%以上的土地用于本村或收益返还本村，这是一个重要调整。再有就是现有的农村资源性资产价值化，例如闲置物业、土地、山林、水面等都开始在不改变性质的条件下票证化交易，意味着从实体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

《慧见》：之前你通过实验和调研下过结论“东亚农业模式就应该是小农村社模式”，而不是建成“像美国大农场那样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这是当时的国情。现在你认为这种国情改变了吗？

温铁军：我一直强调世界三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中一类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野蛮资本主义，最大的野蛮在于把南北美洲和澳洲等大陆的原住民基本上消灭光了，外来殖民者把土地和资源占为己有，移民就有了大农场。但中国人是原住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中国的农业模式只能学习东亚模式，不妨多向旁边看一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比我们先进入现代化，但他们仍然是小农村社制，这就叫东亚模式。这两种异质性很强的模式之外，就是欧洲那些大量移出人口的殖民地宗主国形成了“莱茵模式”，也叫“温和资本主义”。

我国多年改革，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但基

本国情还是如此。虽然高速发展过程中确实推动了一些群体获益，但带来了复杂严峻的成本，主要是发展的代价被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承载，造成了严重破坏。资源环境承担了代价却无声，说不出来，只有在某些特定场合特定条件下才会爆发式地演变成危机。比如现在全球气候灾变，就是人类社会不得不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不反思自己的发展方式，只是听任那些“技术至上”的专家们去处理，往往事倍功半，恐怕主要就是因为思想没调过来。

《慧见》：你曾提到过农村是稳定器，因为农村本来就百业兴旺而不只是农业生产，这和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并不矛盾。现在中国的农村已经越来越具备扁平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链带动，加上发达的高铁、高速、物流、村村通。你认为如今实现农村现代化还存在哪些障碍？

温铁军：首先，切不可把城市中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照搬到农村，简单地把工业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导致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形成混合型的“面源污染”，这就很难再靠技术手段治理。所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不能照搬工业和城市现代化的旧模式。

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应该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城乡融合战略，更多鼓励市民下乡，来形成城乡要素市场化条件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农村的水、电、路、气、宽带五通都已经到户了，就是说每村每户都有了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硬件条件。五通进村意味着每个村都是一个开发区，成为大众创业创新的最好领域。比如，浙江安吉现在就有大量上海

人在那创业，有个村就有几千上海人投资4亿在山区创业。既不会造成污染，生活充满自然情趣，又保护了环境，维持了生态，农村可持续了，国家也更稳定。

《慧见》：所以现在的乡村振兴，是已经慢慢走对了吗？

温铁军：对与不对倒不是谁的主观愿望，而是这个人口大国的客观趋势。例如，为什么那么多上海人到浙江安吉创业，不就是安吉到上海去对市民做招商了。

我去年以来做了两期视频，讲“大疫止于村野”。有些人说农村难道没发生疫情吗？我说没有野的村才发生疫情，只要有野的村，自然资源多样化就是阻挡疫情扩散的天然屏障。

《慧见》：你觉得金融应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什么作用？

温铁军：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假如我们能够让金融供给侧改革直接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那过剩金融的出路就在乡村振兴。

最近十几年，国内金融扩张很大程度上是跟地产泡沫化紧密绑在一起的，现在中央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把它们分开。那现在要让过剩金融下乡，工具是什么？渠道是什么？乡村中有庞大的空间生态资源亟待货币化、价值化，最终实现生态资本深化，但是，有哪个投资商懂得如何做这些事儿？所以大家必须面对金融供给侧不能对应生态化乡村需求的现实困境。

（作者：包慧）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乡村振兴不能只有浪漫情怀

在202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指出，当前中国乡村存在着“人”（老人没有希望、留守儿童得不到照顾、70后城市无法落根不得不回村），“业”（农业回报越来越低、土地流转内卷化），“地”（宅基地、坟地占地较多），“住”（农民积累的资本大量用于乡村盖房）的问题。

他强调，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再延续此前的“年老回村”模式，必须解决70后在城市的“生根”和资本积累问题，增加乡村的养老供给，在农业领域开展要素重组革命，提升农业回报率，适度推动村庄的整合。

乡村面临“人业地住”四大问题

刘守英指出，近年来围绕乡村振兴的讨论越来越热，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情怀和气氛，这让做“三农”的人心存担心。

他在回农村老家时发现，整个乡村，不论是老百姓的精神面貌，还是居住环境都有很大的提升。不过据他观察，农村还存在着以下值得忧虑的现象。

第一是“人”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乡村老人的处境，非常让人心寒。其次是孩子，留守儿童问题早已存在，现在很多孩子被家长带到城市，但实际上家长照顾不了小孩，大部分孩子初中又回去了。再次，是70后的问题，70后到底是不是还要像40后、50后、60后一样回到乡村正在成为问题。这些人在城市里落不下来，回农村又没种过地。

第二是“业”的问题。现在农业越来越单一，回报越来越低，尽管农村也进行了土地的流转，开展规模化经营，但是这种规模化经营也越来越内卷。农业的回报越来越低，就越没有新的要素进来做农业。

第三是“地”的问题。大量的土地被占用，主要是两块，其一是农民的房子开始向交通更便利的地方转变；其二是坟地越来越多，占据了大量土地。

第四是“住”的问题。农民过去积累的资本全部用于回到乡村盖房子。

在刘守英看来，这四大问题看上去是乡村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问题。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本质是老人回村的模式。“不管你在城市干多久，最后还得回村。”

解决70后城市落根问题

关于乡村振兴，刘守英建议：

一是从70后开始，一定要切断原来的回村城市化模式。40、50、60后这拨人在乡村落地养老了，但是如果还是不解决70后在城市生根的问题，解决他们在城市的资本积累问题，就无法解决中国城乡差别问题。

二是要重点解决乡村的老人问题。这包含三个问题，一是政府提供公共品；二是要为农村老人提供其需要的精神寄托和文化生活，而非老百姓不需要的很多“工程”；三是增加养老供给，当前各个地方的养老院是极其缺乏的，这部分完全靠政府来提供也并不现实，需要政府和市场更好地结合，来解决老人养老的问题。

三是推动农业的产业革命。一定要解决农业回报低、农业单一化、农业要素组合缺乏的问题。他认为，农业需要有一场要素重组革命，这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其次还要解决农业经营者的成长、农业要素的重组等问题。

最后，他建议推动农村村庄的适度整合。“很多人都在提这方面的意见，我非常反对大规模的人群集聚，不过以2、3个小队村庄的集聚来解决村落的重新分布问题，这在农村也是非常重要的。”

刘守英表示，在乡村振兴中留住乡愁，是要让未来在城市落根的农民短暂回村后，在新的乡村真正寻找乡愁，而不是让年长者重新回到乡村生活，看到乡村破败的景象而发愁。

（作者：夏旭田）

邓国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乡村振兴将倒逼企业 CSR 创新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与精准扶贫相比，乡村振兴的内涵更丰富，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了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那么，企业当如何参与未来的乡村振兴工作呢？在当前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过渡衔接期，企业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21 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就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关问题与他进行了交流。

21 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与脱贫攻坚相比，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但可能面临的挑战也更大，在您看来，这一挑战的艰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邓国胜：乡村振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首先表现在内涵更丰富，要求更高。脱贫攻坚主要就是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而乡村振兴的内容丰富，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这五大振兴。

这五个方面的内涵都非常丰富。例如，生活富裕并不只是物质的富裕，还包括精神文化的富裕，所以乡村振兴的要求比脱贫攻坚阶段高多了；再比如，产业兴旺，是要在前期脱贫攻坚产业扶贫的基础之上进行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其实是脱贫攻坚的升级延续，脱贫攻坚阶段集中力量做一件事，而乡村振兴是全面发展、全面振兴。

另外，乡村振兴的时间跨度也长，要分三步走，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

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时间跨度一直持续到 2050 年。还有，乡村振兴在地域和领域方面范围更广，脱贫攻坚主要针对的是贫困地区建档立卡户，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中西部，东部发达地区同样存在乡村振兴的问题，只是发展的阶段不同而已。

总的来看，与精准扶贫相比，乡村振兴的内涵更丰富，要求更高，时间跨度长，地域覆盖广，因此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说，参与乡村振兴比参与脱贫攻坚的挑战也会更大、更持久。

我们在调研中，有企业反映，在过去几年的脱贫攻坚阶段，企业每年捐些钱，压力还不大。但是，如果到 2050 年，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对参与乡村振兴的企业而言，压力还是有点大，特别是企业遇到效益不好的年份，压力会更大。这就会倒逼企业需要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参与乡村振兴，要用与过去不太一样的路径和方法去履行社会责任。这就是难点所在。

21 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中国企业过去多年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成效显著，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您认为，过去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企业重视？

邓国胜：最主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企业最大的优势是懂产业、懂市场。所以企业一定要发挥这个长处，在乡村振兴阶段要始终抓住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当然在这方面，参与乡村振兴与参与脱贫攻坚不同，其要求也更高了，产业不仅要发展起来，而且要实现自我造血、三产融合、转型升级，否则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就难以成功退出。

第二个经验是要激发当地的内生动力，这既是脱贫攻坚的经验，也是教训。如果企业不能激发当地的内生动力，就会变成“等、靠、要”。未来在乡村振

兴阶段，企业一定要激发和提升乡村的主体性。这一点相比以前更加迫切，如果乡村的内生动力不被激发出来，就会形成一种相对贫困的文化惰性，导致依附性的增强。

第三个经验是要抓住人才这个核心，加强软件建设。过去企业参与脱贫攻坚，比较注重硬件和基础设施建设。然而，经过多年的投入，现在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沉淀了大量的资产，比如有些欠发达地区，路修得很好，但是路上跑的车少。未来要盘活这些资产，就要加强本地软件建设，特别是人才的培养，培养教师、医生、致富带头人，要抓住这些核心骨干，没有人才，乡村是难以振兴的。

有的企业可能会觉得，培养人才并不是自己的强项，但是企业链接资源的能力是很强的，比如说企业可以链接高校和社会组织的优质资源来为欠发达地区服务，帮当地培养人才。过去脱贫攻坚阶段，企业靠自己单枪匹马就可以包一个村，但现在实施乡村振兴，仅仅靠自己的资源是远远不够的，未来企业一定要善于搭平台，要引流，要思考怎样把社会各方面的闲置资源和生产要素引到乡村，这才是未来的方向。

最后一点，在乡村振兴阶段，企业要进一步帮助乡村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去推动治理有效。有些企业可能会想：这不是地方政府的事吗，我只帮助乡村发展产业就好了。

中央提出五大振兴，这五个方面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如果没有治理有效，最终产业也发展不好。比如，有企业在农村帮助发展产业，成立合作社，没想到反而激起了当地民众的矛盾，彼此因利益冲突而勾心斗角、相互拆台。没有契约精神，就会破坏市场秩序，导致交易成本的提升。所以，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理，乡村的产业也发展不了。正因为如此，企业也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帮助乡村加强基层党建。例如，组织村支书、村党员骨干分子外出考察学习，企业党支部与村支部一对一帮扶建设。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有两种逻辑，公益的逻辑和商业的逻辑，过去企业参

与脱贫攻坚可能更多的是公益逻辑，在未来的乡村振兴过程中，企业应怎样应用好这两种逻辑？

邓国胜：未来这两种逻辑会同时存在。企业参与脱贫攻坚，更多的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以公益的逻辑为主。但在乡村振兴阶段，不同的企业，可能逻辑是不一样的。

有些涉农领域的企业，如卖种子的，就是以商业逻辑为主，主要以利润为目标。这种企业会大量存在，这是一类；另外一类非农企业，主要是履行社会责任，开展一些乡村振兴类的公益项目。

其实还有一类，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社会企业的逻辑，它兼具公益和商业逻辑。这种新的逻辑，可能会是未来乡村振兴阶段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动力、新方向。

因为，过去传统的以公益逻辑参与脱贫攻坚的企业，现在转向乡村振兴，如果还是继续以捐款为主，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资源不足、难以规模化、动力不足、持续性不强。

但如果以纯商业的逻辑参与乡村振兴，又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过度追求利润，就可能顾及不到当地的环境、文化、非遗的保护等等。而乡村本身蕴含的责任很多，它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还是文化遗产的乡魂，是生态保护的根本。如果完全用市场逻辑去开发，可能会对这些乡村的价值带来破坏。

因此，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需要一种新的方式，要可持续、规模化，探索一种能够自我造血的可持续的新机制，这就是社会企业的方式。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发起成立社会企业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比如碧桂园，原来可能更多的是做捐赠，后来成立了一家叫碧乡的社会企业，做消费帮扶，到今天已经开始有盈余了，而且规模越做越大。

以社会企业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以公益为目标，但运作的逻辑却是商业的，这可能是未来乡村振兴的新鲜血液、新的组织载体。

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懂得经营管理的人才，而企业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因此，由企业发起社会企业的模式，更容易走向成功，也是中国

社会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当然，企业发起成立社会企业，要防止使命漂移，一旦企业发起的社会企业挣钱多了，就有可能忘记初心。

当然，尽管企业发起成立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道路并不平坦，但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因此，我们要鼓励企业发起成立社会企业，以社会企业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参与碳中和。我相信，未来这种模式会越来越多。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2021是过渡到乡村振兴的第一年，在过渡衔接期企业应该怎样参与，可能有些企业会感到迷茫，您对此有何建议？

邓国胜：国家政策说得很明确，目前阶段重点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企业之前在乡村做的公益项目，如果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就可以继续做；原来做的与五大振兴能够衔接上的，可以去拓展。

当然，企业要想好在过渡期之后，自己该怎么退出，怎么让乡村自我造血，项目如何持续？最终还得培养人才，培养现代农人，培养当地的职业经理人。

另外，企业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做好参与乡村振兴的规划。比如环保领域的企业，在乡村做生态宜居有优势，而那些没有环保专业知识的企业，可能更多的是帮乡村做链接，对接生态环保资源，搭建大平台，把各类优势资源引进来。大家发挥各自的专长，一起来把乡村振兴事业做好，用这种思路来共建、共治、共享。

刘文奎：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 我们会更加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

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公益组织，在过去几年的脱贫攻坚事业中表现活跃。该基金会与不少企业进行过深入的合作，共同发起和实施了一些成功的扶贫公益类项目。

可以预见，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来的乡村振兴之中，那么，未来当如何应对乡村振兴所带来的新挑战，如何在乡村振兴中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如何与企业开展合作，从而更有效地推进乡村振兴，这些都是值得中国扶贫基金会认真思考的问题。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为此专访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先生，请他谈谈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思考，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的规划。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任务更为艰巨，目标更为宏远，因而将更具有挑战性，中国扶贫基金会如何认识这一挑战的复杂性？

刘文奎：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面对乡村振兴这一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中国扶贫基金会认识到，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升团队能力，拓展工作视野，补齐业务短板，增强“三农”领域理论学习和探索实践。

同时，我们将积极响应现在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大政方针，结合我们的特长和经验，在继续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聚焦欠发达地区，瞄准低收入人口，所有的工作和项目设计都会着眼于促进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了不少成功的扶贫类公益项目，如百美村宿、善品公社等，这些项目在过去的脱贫攻坚过程中产生了很好的成效，未来你们是否有计划对这些公益项目进行

相应的创新升级，从而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的目的？

刘文奎：中国扶贫基金会30年来大部分工作都是针对农村的贫困问题，所以在这30年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包括摸索出了一些成功的模式，包括产业扶贫、百美村宿、善品公社等，在乡村振兴阶段，我觉得这些项目可以继续发挥作用，而且有机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乡村振兴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从有到好、质量不断提升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未来的工作可能会突出三个注重，第一是更加注重人的内生能力的培养；第二，项目的实施将更加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第三，我们的指导思想会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们未来的项目会围绕国家乡村振兴提出的大政方针，结合我们的特长和经验，我们将集中在三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产业振兴。乡村振兴具体有五大振兴，第一个就是产业振兴。在这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经过20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模式，所以，未来产业振兴是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会以项目来带动，然后再加上人才培养，形成两轮驱动机制，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个方向是生态宜居。这方面我们将整合过去的项目，包括救灾减灾防灾，让社区更安全；援建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等，让乡村更便利；推动蚂蚁森林等环保项目，让乡村更美丽。

第三个方向是人的发展。五大振兴里人才振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将继续深化开展童伴妈妈项目、顶梁柱项目、养老项目等针对特殊困难群体的项目；另外以教育项目、健康项目、就业项目来瞄准人的发展。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社会公益组织在与企业合作开展扶贫公益项目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才能充分地发挥企业的优势，从而保证公益项目的成功运营，在这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刘文奎：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明确方向。要根据企业捐赠资金、投入精力以及公益投入的意向和需求，明确任务，制定具体的项目，例如互联网企业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并立足实际情况，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建设电脑教室以及网课系统等。

然后是选准参与渠道。要根据公益项目的内容选择合作伙伴，通过有效的渠道开展工作，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星巴克合作的“共享价值”咖啡产业扶贫计划，就是确认任务目标后，精准地选择参与渠道，推动项目落地实施。

最后是发挥自身优势。在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中，要根据企业自身的优势，有渠道的发挥渠道优势，有技术的发挥技术优势，有资源的发挥资源优势。例如百胜中国通过开放企业遍及全国的线下门店渠道，与基金会合作开展“捐一元”公众筹款项目，通过餐厅服务员向消费者劝募的方式筹款等。

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慈善公益事业不断取得进展，企业在参与公益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我们也关注到了这方面的一些变化。

比如从注重过程到注重结果的变化。原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多的是注重过程，可能不太关注结果。随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断提高，也逐渐开始注重公益项目的实施情况、项目给受益人带来的改变等，也就是更加重视公益项目的效率和效果。

二是从注重硬件建设到注重能力建设的变化。以前企业更喜欢修桥、铺路、建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类的公益项目。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升级、社会问题及需求的变化，企业关注的重点也发生了改变，越来越注重对受益人及受益群体“软实力”的提升。通过开展教育培训、开展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等发展类项目，培养更多“会修路的人”。

三是从注重补短板到注重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变化。以前开展的公益扶贫项目，更多的是受益地区“缺什么给什么”的模式，主要以直接援助的方式进行。现在，企业通过发展产业扶贫项目，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

让受助群众能够发挥自身能力、整合更多资源，用长效机制摆脱贫困。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未来的乡村振兴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同样会与很多企业进行合作，鉴于乡村振兴的挑战更大，对于如何与企业进行合作，如何更好地发挥企业的作用，你们是否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创新思路和举措？

刘文奎：企业通过捐赠，带来了脱贫攻坚的增量资金。我们统计过，企业捐赠占基金会总体捐赠60%左右，占比较大。例如中国民生银行、中国一汽、中国三星等企业每年都有大额的捐赠。正是这些捐赠企业的高度信任、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业务发展才能实现新突破，迈上了新台阶。

未来，乡村振兴会带来更大的挑战，但好在我们过去多年与很多企业合作，也积累了不少公益扶贫项目运营的经验，对于企业和我们基金会而言，过去的一些好的经验未来都要继续运用。

比如，一些企业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参与扶贫项目创新。多年来，基金会和企业共同发起了许多创新的品牌项目。

基金会与中国三星、中国民生银行、中石油等企业发起的百美村宿项目，通过探索全新的“乡村旅游扶贫+”模式，致力于搭建乡村和外部连接平台，重估贫困村价值，创造以村为本的发展机会。以村民合作社为依托，积极引入社会资金、信息和人才等要素，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中国扶贫基金会与苹果公司等企业发起的善品公社项目，通过在全国贫困农村地区支持小农户组建合作社抱团合作，通过品控管理生产出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依托互联网、电子商务和新零售等多种渠道有序链接市场、培育地域农产品公共品牌，以此通过市场的力量支持小农户组织合作能力、品质生产能力和市场对接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可持续脱贫。

还有一些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与基金会联合搭建“人人公益”的平台。比如，基金会与沃尔玛共同发起“你沃一起，为爱加餐”活动，利用企业遍布全国的线下门店，以企业员工向消费者劝捐的形式，号召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士持续关注贫困地区学生的营养状况。另外，基金会还与苏宁、中航信托等企业合作开展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动，倡导和动员公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公益。

今后，我们将与合作企业一道，进一步创新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在产业振兴，生态宜居和人的发展三大方向，我们都期待着与更多的捐赠企业开展合作，动员更多社会公众参与乡村振兴和社会公益。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个阶段，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为了顺利地过渡到乡村振兴阶段，你们计划或正在做些什么？

刘文奎：现在中国扶贫基金会肩负的重点工作，是实现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要多实践多探索多创新新的项目，使欠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大化。一手巩固脱贫成果，一手推进乡村振兴，既要目标长远，也要坚持到底。

为了顺利地过渡到乡村振兴阶段，第一，中国扶贫

基金会很早就认识到了变“输血”为“造血”的重要性，不论是一开始的中和农信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还是善品公社电商扶贫项目，或是四川省蒙顶山合作社发展培训学院，都是在创新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农村家庭的自我发展意识和意愿，引导农户由“被动扶”向“主动兴”转变，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好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在项目运营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村民和基层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善品公社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诞生的。

第三，项目目的设计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产品的质量好，才能获得市场认可，然后真正的赚钱，赚钱的项目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秉持需求为本的理念。我们根据欠发达地区以及低收入人口的需求设计项目，现在的工作重心从资源导向变成了需求导向，更加关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从促进乡村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

陆波：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整合社会资源，聚焦乡村人才

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简称“乡村发展基金会”），由知名企业家王石、冯仑及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海闻于2019年1月共同发起成立，其宗旨是：发展新农业、建设新农村、培育新农商，致力于成为中国乡村创业创新的加速器。乡村发展基金会计划邀请国内100位企业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作为联合创始人共襄盛举。资深公益人陆波博士任基金会秘书长。

乡村振兴是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领域，而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如何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助力，需要思考和行动。由于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相比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组织，在未来参与乡村振兴时都要有创新的思路 and 模式，双方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进行合作，从而最大化地发挥商业与公益的力量，共同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我们希望通过记录和传播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有效模式和经验，让更多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有所借鉴。为此，我们发起“责任先锋访谈”，与CSR、公益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领军人物对话，了解他们对乡村振兴的思考和洞见。

陆波博士从2007年开始专职从事公益，在与企业合作开展公益方面历练丰富，颇有建树。乡村发展基金会以人才培养作为参与乡村振兴的切入点，为此设计了多个新颖的公益项目，正在努力实施推进。我们日前专访陆波博士，与他就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公益人与企业家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希望做有价值的探索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乡村发展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的切入点是人才培养，这是基于什么样的

考虑？人才培养本身是很重要的事情，除此之外是否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你们认为自己在人才培养方面比较擅长？

陆波：当初王石先生、冯仑先生、海闻教授三位发起人成立乡村发展基金会，是想利用民间的力量推动乡村发展。作为新成立的社会组织，我们要将热情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专业知识和能力，人才培养非常重要。我们基金会的众多联合创始人，虽然不一定都在从事乡村工作，但他们都是各行业的领军人物，有各自不同的见识和资源，可以为乡村人才培养提供一些思路 and 办法。基于这样的初心，我们决定就从人才培养入手。不一定是我们的擅长，但我们觉得这方面有优势，有资源，也有潜力。所以，乡村发展基金会是以乡村振兴为切入点，参与乡村振兴。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不是一个能在短期内见效的事情，但是乡村振兴又急需人才和知识的投入，你如何看待这个矛盾？

陆波：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是存量和增量的关系，现在在乡村生活工作、正在为乡村振兴挥洒汗水的人，他们是存量人才；还有更多对乡村振兴跃跃欲试，或者持观望态度，甚至根本就不了解乡村的城里人，他们是潜在人才，或者说增量人才。我们做教育培训，一方面要激活存量人才，让他们的能力和见识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还要让乡村以外的人关注乡村，走进乡村，这同样也是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第二是近期和远期的关系。让乡村提高亩产、让牛多产肉、鸡多下蛋、把乡村改造成民宿……这些属于近期目标，需要专业技术人才来实现。乡村振兴还有远期目标——乡村的人，还有即将走进乡村的人，他们如果能增长视野、开阔思路，如果他们之间有相

互沟通和合作的机会，那他们今后为乡村发展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是改变与提升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人才观。很多人认为，乡村的人不是人才，没有文凭就不是人才，虽然人才不等于文凭，但人才至少得有文凭。我在去乡村之前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认为的，但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最近接触到一些研究乡村的专家学者，他们说农民是天生的商人。传统的农村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民自产自销，天然就有经商意识。“小农意识”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还有人说，农民是天生的环保主义者，而且还是天生的建筑师。以前农村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架构很稳，地震来了，墙倒房不倒；土坯房透气，性能非常好。在农村，传统上是没有真正的垃圾的，一切都可以还田再利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农民是不是人才？当然是人才。但是他们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是不是就足以满足乡村振兴的需要呢？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既要珍视他们的才华，也要帮助他们提升。我们不要期望通过培训就能无中生有，让一个原本一无所长的人变成人才，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为他们赋能，给他们输入现代化的理念，为他们提供资源，去激活他们、提升他们，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政府很重视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社会各部门、很多企事业单位也都在为人才培养出谋划策并付诸行动，你们基金会能在这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独特作用呢？

陆波：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一句话：非营利组织所做的工作，既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政府。非营利组织既不提供商品或服务，也不实施调控，其产品既不是一双鞋，也不是一项卓有成效的法规，而是经过改变的人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也很适用于我们当下。

我认为，在乡村人才培养中，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在乡村振兴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中，我们要去摸索需要什么样的人

才？这样的人才又需要什么样的培训课程？这样的课程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应该怎样去推广？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人去思考和行动。

如果经过我们的实践，证明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提供给政府，政府的力量更大，可以快速复制推广；如果发现此路不通，那也可以作为一个试错的案例，再换一种做法。我认为这是基金会能发挥的一个很独特的作用。

对于乡村发展基金会而言，我们要整合广泛的社会资源，聚焦在乡村人才培养这件事上。我们还希望能发挥创新和引领的作用。我们特别希望探索出来的人才培训模式是有价值的，是值得推广的，而且能和我们联合创始人的社会资源结合起来，能够引申出去。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会特别有价值。

重视项目的实效性和可复制推广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你们在延安大学成立了乡村发展研究院，提出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一种长效机制，既能培养人才也能留住人才，为此你们具体做了哪些探索？到目前为止，在乡村发展人才培养方面你们取得了哪些进展？

陆波：针对乡村振兴所需人才的培养，我们提出了三结合的方式：一是学历与非学历相结合，就是延安大学乡村发展研究院开展的硕士生培养，和针对村镇干部、新农人、普通人的非学历培训相结合；二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我们做培训不光是解读政策，或借鉴国外，还要走向田间地头，让学员在干中学；三是线下与线上结合，疫情期间尤其如此。

我举两个实际的例子。一是“明日地平线大讲堂”项目，最初是希望我们的联合创始人走进校园与大学生（特别是农林类大学生）沟通交流，原计划一个月一场，做了三场后，来了疫情。我们马上改变模式，与搜狐合作，通过搜狐视频做线上讲堂，开始讲疫情期间防病毒常识，疫情对生活、经济的影响等，后来讲乡村振兴。到今天为止已经做了4季60多场，平均每场受众有18万人之多，这是线下远远不能比的。

另外一个项目“嘉种计划”，是为乡村振兴重点

人群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今年7月，我们与北大团委合作，选派18名大学生到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农场生活居住十天，耕读研学。白天学习做农活，观摩农场经营；晚上安排农业课程、乡村振兴案例解读；每天早晨还进行赛艇训练磨练意志。很多学生刚来的时候并没什么期望值，但是十天后感收获极大，依依不舍。无论这些学生今后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希望这样的耕读研学能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振兴乡村的种子。

“嘉种计划”的第二个系列是针对乡村干部。乡村振兴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乡村干部来落实和完成，他们十分需要拓展视野、提升技能。我们前期做了大量调研，为乡村干部开发了一款乡建课程，分两期进行。10月份刚刚完成了第一期四天的课程，我们请国内一流专家去甘肃渭源县，为该县的100名乡村干部授课；第二期，我们会带着他们走出来，到我们精选的乡建基地，让他们亲自看、亲身体会，然后把他们看到的、体会到的知识技能再带回渭源，规划落地乡建项目。

无论是“明日地平线大讲堂”还是“嘉种计划”，我们都非常重视项目的实效性，以及它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能够在不同地域发挥作用。因为项目开展的时间不是太久，现在还不敢说有怎样的成效。但在项目的设计和运营上，我们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公益组织要好好研究企业，学会与企业家共处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现在很多企业都有参与乡村振兴的计划，大多是以某个公益项目的方式来推进，通常不会单纯着眼于人才培养，如果这样的企业要找你们合作，你们会如何参与？

陆波：我们现在只做人才培养，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一个新成立不久的基金会，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我会明确地将这一点告诉合作伙伴。越是有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其实越能吸引长期的、真正的合作伙伴。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为企业赋能，不和企业“抢戏”。与我们合作的很多企业都是很有能量的。

我们与之合作，是希望能为他们插上翅膀，开拓一片公益的新天地。我们不会对企业说：“你要按我说的来做，我比你专业，肯定比你做得好，你要听我的。”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你们计划要招募100位联合创始人，现在这个目标完成了吗？人多可以汇集资源一起做大事，但也会带来意见难以统一、行动难以协调等问题，这对于你个人而言是不是一个新的挑战？

陆波：我们三位发起人的号召力很强。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有90位联合创始人。今年我们有意地放慢了招募的脚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项目的设计和运行。按照以前的速度，100人很快就会招满，这个目标要实现根本不是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从事公益慈善比较喜欢抱团。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组织创新，具有中国特色。毫无疑问，人多了肯定协调难度大，但我更想说的是：我觉得很兴奋，因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联合国内这些顶级企业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在这个平台上聚拢，让大家认可这个组织，支持这项事业。

其次我才会觉得，协调工作可能是要多花点时间，会考验我的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偶尔会有这方面的烦恼，但这是次要的。我想得更多的是，怎么把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公益组织，变成一个现实的存在，然后再变成一个经典的案例。这是我特别想做的事情。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与企业家合作，帮助他们开展公益慈善，这是现在很多公益人都在做的事情，如何才能将这种公益与商业之间的合作做好，让双方的目的都能很好地达成，在这方面你能否提供一些可供其他公益人借鉴的经验？

陆波：每个基金会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很难说有什么经验能给别人借鉴，但是我确实有一些体会和思考。

我做的是纯公益，基本上不考虑公益与商业之间怎么搭桥、如何借力。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纯

公益反而是最难的，因为它考验公益经理人的专业能力和内心定力。想想看，现在哪家大企业没有社会责任部门？知名的企业家，哪个没有以自己或者公司名字命名的基金会？那人家为什么还要捐钱给你，为什么要与你合作？那一定是因为你在公益方面有更专业的能力，能为他们带来更满意的效果，否则他们自己去做了。

我认为，做公益，当你的合作对象是企业家的時候，必须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公益和商业的关系。企业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企业越做越大，一定在商业方面有永不止步的追求，否则他就不是企业家。我们的公益项目能给你的公司业务带来什么好处？我从来不这样诱导别人。但是在做公益的过程中，企业家在我们的平台上，自然会结交到志同道合的商界朋友，自然会产生商业合作的火花。我为他们创造平台和机会，但是我不为此而在公益项目上做特别的设计。

二是近期和远期的关系。企业家通常希望你快出成果，这是他们的工作节奏和习惯思维所决定的，但是公益是对社会的推动，要看长效，它一定比较慢的，否则就不是或不完全是公益了，那么在远和近之间就要找平衡。我通常会将一个长期的项目分解成几个子项目，或者分解成几个阶段性目标，让企业家看得见、摸得着，因为有的企业家还要向董事会和股东汇报。这样做，既能让企业家容易看到项目的进展，而我又不必改变公益的使命和节奏。

三是广度和深度的关系。企业家通常希望公益项目快出成果，而且要更多地让别人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公益人会专注项目本身，更希望将项目做深，透彻地解决一个社会痛点。广与深之间是有冲突的，这也需要我们公益人来平衡，或者是磨合，让双方都能够包容，都能够理解和接受。

我一直认为，做公益一定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很多基金会和社会组织都自称是“草根”，因为没有多少资源和能量，只有一颗善心。那我们的善心怎样才能实现？我们一定要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现阶段，企业家在中国的慈善公益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捐钱捐物，还有资源整合、高效务实、结果导向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公益组织一定要好好研究企业，学会与企业家共处。另一方面，企业家的善心也需要有人帮他们去落实并发扬光大，否则他们有很好的发心，最后却实现不了，甚至被误解，就太可惜了。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今年是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第一年，乡村振兴成为一个社会关注度很高的话题，这对你们基金会的工作是否产生了某种影响？

陆波：我想分两个方面来讲。首先，我国的脱贫攻坚战让将近一亿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可以说是举世瞩目。但实事求是地说，社会组织在这个阶段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甚至有专家指出：“中国公益组织在精准扶贫中集体性缺位”。今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年，未来还要做几十年，我特别希望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能够真正发挥出独特的作用来。

其次，我们可以说是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候，乡村振兴现在成为一个社会关注度很高的话题，这对我们的工作肯定有积极的影响。但我个人的感受是，关注度还不够高。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组织不太为世人所知，也可能与我们自身刚刚起步、影响力不足有关。举个例子，我们秘书处最近在招聘员工，我得到的反馈不是很积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乡村发展，关注公益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重视研究乡村振兴，能做这样的访谈，很有远见！谢谢你们！

第五章

乡村振兴优秀案例

1. 综合案例

多维度探索，感受乡村发展的蜕变

2018年9月，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对年久失修的南雄市角湾村门楼开展拆除重建工程。经过与设计方、工程方等团队共同深化方案、出具施工图纸后，村民提出了“门楼瓦梁根数不能是双数，否则会对村子不利”的问题。

民间风水问题向来是一个大学问。在对原有的门楼进行测绘还原时，设计团队发现门楼原本的瓦梁根数就是10根，为双数。风水问题向来像是一道无解题，如何在拆除重建过程中，更巧妙地回应村民提出的这一诉求呢？根据门楼的测绘还原图纸，基金会与设计团队发现，门楼最右侧的一根梁，已经属于室外范围，而室内范围其实只有9根梁，恰好符合村民提出的单数需求。经过与村民们的反复沟通，这一观点获得了村民的理解，最终门楼的瓦梁根数按原状恢复，顺利推进工程进度。



·角湾村门楼

回首近年来全面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工作感悟，基金会以探索者、实践者、见证者等身份感受着乡村发展一次次的蜕变。

2017年，为积极响应省政府提出的2277个省定贫困村新农村示范村建设的政策，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捐赠2亿元用于韶关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公益项目。2018年6月，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在韶关成立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全面、持续地参与韶关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

作为定位于兼具扶贫、乡村振兴类项目执行业务与公益生态培育类资助业务的混合型基金，基金会秉承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总要求，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推进乡村建设。目前，基金会在韶关市仁化县、南雄市、浚江区，佛山市高明区以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多维度的乡村振兴探索，致力于通过整合跨界资源，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

（一）产业振兴

乡村要发展，产业是关键。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大前提。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服务乡村经济，有利于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为此，基金会积极推动乡村产业发展，通过建设乡村民宿、推广乡村风物、农业种植等方式，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2018年，基金会与美的置业对韶关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农产品进行调研与甄选，打造“韶关风物节”，推广当地特色农产品，联动市场上下游，借助多个渠道，将贫困村特色农产品推广至全国市场。风物节所得利润悉数捐给基金会，用作韶关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

2021年7月，位于仁化县河富大井村的乡村民宿“爱树·丹霞山苑”正式对外营业，这是基金会在乡村振兴经济大背景下“民宿扶贫”模式的实践与探索。大井村紧挨省道S246线，交通便利。拥有丰富的古树资源及农田景观，依托丹霞山形成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风貌。此外，大井村历代人文遗迹多样，古驿道文化及抗战红色文化成为最耀眼的物质文化。然而，资源优越的大井村也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问题：作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待提升；背靠丹霞山，但偏离主要旅游线路且缺

乏亮点元素；种植业发达，但产业效益低，也导致村民和村集体收入相对较低，缺少发展集体经济的资本。

在多次考察调研后，基金会以乡村环境提升、精品民宿为启动引擎，通过“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东、农民变股东”路径，激活农村自然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让村集体、农民、经营主体“三位一体”“联产联业”“联股联心”，促进农业产业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

基于此，基金会联合惠州市爱树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当地政府多方参与资助河富大井村启动民宿项目，打造以民宿产业为特点的美丽宜居乡村和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工程，助力河富村实现乡村振兴。其中，基金会代表河富村委会投入民宿主体建设资金，河富村以仁化县董塘镇河富经济联合社（下称“联合社”）名义，与爱树文旅共同出资成立运营公司——韶关爱树民宿客栈管理有限公司，运营公司租用大井村土地及民宿主体物业，从事民宿经营相关业务。此外，联合社每年将获得50%实际营业利润，不低于20万元的收益，其中60%收益支付给大井村。联合社和大井村必须将实际所得成立村居公共发展基金，鼓励村民申报项目，推动村庄发展。

此外，基金会还支持南雄市阳光玫瑰葡萄产业扶贫项目、仁化县新龙村微生物高新农业示范基地等产业项目，促进农业产业振兴，提高乡村经济效益。



• 大井村民宿产业

（二）人才振兴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吸引更多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能出彩，保障人才数量、结构

和质量能够满足乡村振兴的需求。同时，着力培养有才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建设的主力军。为积极推进人才培养，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设立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支持韶关仁化中学和泰源小学的校园工程建设；支持凉山州教师教育培训系统建设。同时，基金会助力村民赋能，通过农业技术传授、组织专业培训等项目，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并且支持乡村儿童教育发展，组织课程义教、专题活动等。



• 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三）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作为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文化振兴需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一直以来，基金会将乡村文化振兴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各领域、全过程，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通过5所宗祠重建或修缮、多个节日庆祝和礼俗传承等项目，培育乡村及村民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积极构建文明社会风气，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 大井村邓氏宗祠



· 新龙村古树古井

（四）生态振兴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良好的人居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为了解决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国家近年来推出相关政策，明确任务目标：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制定了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乡村绿化、乡村水环境治理和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等六个重大行动。

为积极响应省政府提出的省定贫困村新农村示范村建设的政策，基金会在生态振兴板块的工作，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提升作为重要内容，与韶关政府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分工明确。从宜居环境和公共空间建设方面，合力推进多项乡村工程建设。

其中，共同缔造是基金会进行的创新性尝试。通过充分挖掘乡村社区的需求，以参与式规划/建设的方式推动新农村示范村建设：引入专业设计团队，与本土村民组成三合一团队。在仁化县新龙村，从新组的古榕树和古井都有悠久的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井老化，古树也因缺乏维护而失去生机，村民也因此提出修缮诉求。

了解情况并调研后，基金会决定以现金捐赠的方式支持古树古井项目的建设，同时提出参与式规划的构想，

即项目的规划、地点选定、原材料的采购、工程的建设、后期项目的管理皆由村民全程参与；本土设计师由基金会邀请进行项目设计。在建设初期，村民们更多是处于一种被动观望的态度。如何发动村民参与共同建设成为新模式下的第一个难题。

随着工程推进，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向村民进行规划宣讲和方案汇报、村民骨干的带头参与作用下，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其中。在建设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原本的古树范围围背后是一堵庭院围墙，围墙占据了古树的可活动范围，经与围墙主人协商，其主动将自家围墙退



· 召开村民大会

后了十几公分，扩大了古树的公共活动空间。在古树古井的建设过程中，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还通过自主学习提供更多想法。共同缔造这一创新模式，加强了基金会与村民的连接，村民的能力得到提高，参与村庄活动及公共建设的积极性得到鼓舞，村庄的凝聚力得到提升，村庄内生动力得以勃发。

（五）组织振兴

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也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的根本保障。其中，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其次，需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2018年起，基金会从自组织培育和社区治理两方

面着手，培育黄子塘欢乐广场舞队、大井理事会、新龙村广场舞队等多支乡村自组织，并协助乡村成立多个乡村合作社，用组织振兴点燃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目前已累计执行5个整村推进的乡村振兴项目，培育出3个乡村自组织，举办5场大型会议及交流活动，开展近70场社区活动，累计推进77项乡村工程建设，惠及3万余人。不同项目村先后荣获“广东省十大古树乡村”称号、入选由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评选的社会组织扶贫50佳案例等。同时，在四川省凉山州的布拖、金阳、美姑等县，基金会相继支持了30余个精准扶贫项目，直接受益人数6万余人。在佛山市高明区，基金会也将开展以人居环境提升为主体、以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为目标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2021年，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我国第一个以“乡村振兴”注册的基金会，基金会将继续坚守乡村振兴的初心和使命，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 新龙村广场舞队

2. 产业振兴类

蓝润集团：唯实惟先 善作善成

“两个一百年”凝心聚力，“十四五”开局昂首阔步。“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为企业家如何履行好社会责任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工商联更是将“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引导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2021年工作要点。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分子，蓝润集团秉承“实业报国 服务民生”的企业使命，始终奉行“得益于社会，奉献于社会”的企业公民理念，致力于以产业引领、人才支撑等方面，积极推动“十四五”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积极融入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以志为方向、以勤为动力，扶民生，润民心，助民志，与国家、人民一起前行。

产业链变“共赢链” 与山区人民共同富裕

一座座养殖场拔地而起，一批批生猪从这里输送到全省各地……近年来，四川省巴中市的生猪产业发展提速，不但让乡亲们鼓起了腰包，而且带动了整个山区的特色农业。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发展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治本之策，也是乡村振兴的长远之计。在这个关键的开局时期，以农牧食品业为主的蓝润集团，将产业振兴的焦点放在四川省东部地区，于近年在巴中、南充、达州三地布局了近20个规模化生猪养殖全产业链基地，相关项目连续两年被列入省重点项目。不仅在川东北，蓝润还

依托产业优势，在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觉洛乡树干村投资扶持当地建设小型养猪农场项目，对当地开展“造血式”扶贫，从根本上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蓝润集团的战略目标十分清晰：坚持以发展产业的方式建立长效扶贫机制，聚焦产业链搭建，通过科技化、现代化高度赋能，激活产业链上下游动力，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加快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最终将产业链变成“共赢”链。

培人才活水 育发展之“鱼”

四川省巴中市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122.7万人，占全市人口三分之一，李红和丈夫康道俊就是其中一员。两年前，夫妻俩选择返乡就业，进入蓝润项目工作。“在外打工面临的困难很多，现在离家近了，可以照顾老人孩子了，一年收入算下来也有10多万，更有干劲了！”

农村宜居宜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农民富裕富足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蓝润集团坚持“培人才活水、育发展之‘鱼’”的扶持思路，持之以恒地为社区农户提供养殖全系列相关的公益性技术培训，定期安排技术人员举办技术培训班，帮助家庭农户掌握先进养殖技术、学习使用现代农装设备，培养家庭农户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新型职业农民。同时，为返乡人才提供职业发展平台，并采用定向合作、支持家庭生态农场等机制，培育有志之士成为推动乡村建设的乡村能人，通过能人的示范、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在这期间，还通过修建公路、拓展荒地、修建引水工程，为当地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二十余年来，蓝润集团持续延伸产业链，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累计创造逾百万个就业岗位。

蓝润认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源动力，农民是主体，人才是关键，需要构建人才“聚宝盆”，加强农村专业人才培养建设，培育造就更多新型职业农民，聚起乡村振兴所需的人才要素，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以家国为己任 履责公共重大事件

作为一家稳健发展了二十余年的民营企业，蓝润集团紧跟经济新常态，精耕大消费领域，聚焦农牧食品业主业，始终以发展的眼光发掘民生所需的产品和服务，构建了全国化布局和国内领先的食物研发体系，助力我国双循环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而在蓝润的发展

宗旨中，服务国计民生不局限于产业发展和就业支撑，在若干重大公共事件中积极履责也是题中之义。

面对新冠疫情，蓝润集团协同旗下产业先后向社会公益机构捐款 600 万元，为商户减免租金 360 余万元。成员企业龙大肉食克服困难，确保生猪充足供给，保障老百姓的“菜篮子”不受影响。集团员工还自发创作公益歌曲，向一线人员表达真挚祝福与敬意。此外，蓝润还在重大公共事件救助等领域累计投入超亿元，积极贡献企业力量，践行企业担当。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蓝润集团将跟随新时代的中国民营企业步伐，践行企业公民义务和责任，不断探索和拓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进步的路径和方式，为推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贡献企业力量。

2. 产业振兴类

袁家村模式

——开创乡村振兴民俗游样本

即使不是在节假日或双休日，陕西关中平原腹地礼泉县的袁家村也不失其繁荣：小吃街美食飘香，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品尝；酒吧街上歌声回荡，情侣们在悠闲漫步；古色古香的茶馆里，客人安坐品茗，一边观赏关中乡村的独特风物，一边体验午后时光的闲适与慵懒。

据统计，袁家村的人流平日里有4~5万，周末则达到6~7万，而每逢五一、国庆及春节长假日，一天的最高客流可达20万人次。这个原本只有62户、286人的小村庄，年接待游客达600万人次以上，年旅游收入超过10亿元。

从一个与周边其他乡村区别不大的小乡村，发展成为如今陕西省乃至全国最受欢迎的乡村旅游胜地，被誉为“关中第一村”，袁家村仅用了十年的时间。

关中印象体验地

袁家村位于关中平原北部，距西安约90公里，处于山地和平原的过渡地带。距袁家村10公里处的九峻山上，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袁家村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特色建筑等自然人文资源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袁家村成了“富裕村”。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产业政策调整，淘汰落后产能，高耗能、高污染的村办企业陆续倒闭，袁家村陷入了发展困境。

2007年，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提出了乡村发展转型的思路——打造关中民俗文化旅游第一品牌，大力开发乡村旅游业，由三产带动一产、二产发展。

让村民在不离家，不离村，就能就地挣钱。具体做法就是，以村子为载体，以村民为主体，建设民俗浓厚，特色鲜明的“关中印象体验地”。

袁家村的人在全国各地收购老木头、门窗等，投资几百万元在村子里建起了一条古色古香、商户林立的街道。2007年，“关中印象体验地”开门迎客。

踏着脚下的青石板，行走在街道上，你会看到：剪纸坊里，巧媳妇正在熟练地剪着窗花；酒坊中，年轻的关中女子正在向游客展示着窖藏的“女儿红”；布坊里，满脸沧桑的大妈正坐在织布机前织布；豆腐坊中，大爷正在用传统工艺制作老豆腐。油坊中飘来的油香、药坊中飘来的药香、辣椒坊中飘来了辣酱香。场院中，一头驴拉着石磨不停转圈碾着各种调料……一幅原生态十足的关中农家生活画卷展现在游客面前。

捍卫食品安全

“关中印象体验地”围绕“吃”字谋篇布局。一条街上有100个商户，就要有100种小吃，决不能重样，以避免同质化竞争。锅盔、豆腐脑、炸麻花、面皮……村民各自认领，如遇几家同时报名，便一决高下，只留下味道最好的那一家。

要想让人放心来吃，食品的质量和安全的重中之重。

袁家村摸索出一套完善的食品质量管理体系。以原生态和零添加的方式，用农民的办法捍卫着食品安全。前店后厂，操作透明。每家店铺所有的配料原材料要公示，所有的店主要悬挂食品安全承诺书。

老街十字路口的粉汤羊血馆是袁家村人流量最大

的门店之一。粉汤羊血配料很简单：羊血、粉丝、豆腐、香菜、葱末等食材，然后浇上浓浓的热汤，喷香扑鼻。

店主发下毒誓：“如果羊血掺假，甘愿祸及子孙。羊血亲自采于礼泉西关某杀羊点，李某某处。电话139……豆腐、粉条、辣子、菜籽油均采自袁家村作坊内。汤为原汁骨头汤（土鸡一只、骨头5斤、水100斤）”。

在袁家村，如果出现假货，商户将被永远除名，产品质量在这里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丰富而又各具特色的美食品类、值得信任的安全管理、亲民的价格体系，满足了游客的心理需求，于是游客口口相传、微信分享。

更多的游客奔着关中小吃而来，袁家村因小吃而迅速走红。

合作社孵化

2010年，随着游客数量与日俱增，袁家村开始升级做乡村度假，打造民宿和精品客栈，发展酒吧街、艺术街、时尚街、主题街，想方设法让游客住下来。

从度假游到主题游，再到深度游，袁家村通过提升业态来增加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感。在提升业态的同时，抓农民教育，开办“农民学校”和“袁家村夜校”，以解决农民的思想、教育和服务问题。袁家村每年都会组织村民外出学习，他们曾经组织300多人分六批分别去日本学习。学习日本人在服务上对人的尊重，在产品上精益求精的精神，回来后不久，村民的服务水平和产品意识大为改观。

袁家村提供优惠政策，吸引能人或手艺人进入袁家村经营，并扶持优势项目，将其孵化成合作社，为农民搭建创业平台。所有合作社股份对全体村民和商户开放，相互持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村民自愿入股，但入股的数量会进行调控，有钱的人少入一点，没钱的可以多入点，合作社的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带动农民共同富裕。

走在袁家村街道上，人们会看到一些商户外面的墙壁上挂着合作社的入股名单表。袁家村酸奶店，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一年的纯收入是700万元，

是袁家村分红率最高的合作社，分红率达到130%，这意味着入股1万，每年能分到1.3万元。

在利益分配上，袁家村始终将本村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外来商户要进入袁家村，必须服从村集体的安排，必须照顾本村村民的利益，必须分享其在袁家村的既得利益。你在这里赚的每一分钱，都要与袁家村村民分享。

袁家村目前已形成了豆腐、酸奶、醪糟、辣子、醋、粉条、菜籽油等作坊和小吃街等股份合作社，均由村委会下属公司进行经营。小吃街合作社每户根据收益情况，按不同比率进行利润分成，收益高的比率降低，收益低的比率增大，对一些不挣钱却又是小吃街必备的品类合作社给予补贴，最低保障以家庭为单位每年8万-10万元的收入。

通过全民参与，袁家村把所有人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互为股东又互为经营者，商户、村民齐心协力，共同维护袁家村的招牌。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袁家村总结出了“袁家村模式”，并将这套模式输出到了青海、河南、山西、湖北等地，计划在各地打造不同地域文化的袁家村。据不完全统计，在陕西省，就有60多个乡村在复制“袁家村模式”。

成功的“袁家村模式”

虽然不少乡村都在复制“袁家村模式”，但成功的并不多，其原因盖在于，很多地方都只是学到了一点袁家村的皮毛，而并未得其真传。袁家村为什么能如此成功？用村支书郭占武话来说：“袁家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因地制宜，我专注于自己能做的，专注于自己本身的一些东西。”的确，善于因地制宜，是袁家村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在我们看来，“袁家村模式”之所以成功，在于它因地制宜地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袁家村模式”成功解决了偏远乡村如何吸引游客并形成规模化客流量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困扰着很多试图发展民俗文化产业的乡村。一般来讲，能吸引旅游者的，要么是秀丽的自然景观，如山秀

水，要么是独特的人文景观，在这两方面袁家村都没有优势。

然而，袁家村“无中生有”，巧妙地将乡村传统习俗和村民日常生活当资源，组织村民恢复关中民俗，重建乡村生活，袁家村就是景区，家就是景点，村景一体，全民参与。来到袁家村的游客可以全方位、零距离、多角度体验和感受乡村生活的真实性和独特魅力。袁家村卖的是乡村生活。

其次，“袁家村模式”成功地解决了旅游产业化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问题。乡村旅游市场很大，但是企业和产业很弱，很多旅游企业不挣钱，产业做不大。袁家村以市场为导向，把农民培养成经营主体，农民做的是自己最熟悉的事情，普通常见的农副产品都做成了高附加值的旅游产品。在袁家村，凡是农民做的，或是与本地乡村生活相关的产品，其市场表现就好，反之则不好。

袁家村以旅游创品牌、逆向发展的模式是一大创新。他们用三产带二产促一产，实现三产融合发展。例如，袁家村的油泼辣子，最早是郭占武创意设计和恢复的一个关中民俗场景。在康庄老街的一面土坡下，一头老黄牛、一个石磨盘，一个农家妇女，碾好的辣子烧开的菜籽油一泼，满街飘香。既是美食，又是乡愁。大受游客青睐，边看边买，供不应求。郭占武判断该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随即建起作坊，扩大油泼

辣子的生产能力，使之逐步产业化。就这样，一个三产的一体验场景转变成为二产的加工项目，小小一瓶油泼辣子从一开始的年营业额不足10万元到2018年营业收入高达800多万元。

其他如酸奶、面粉、醋、粉条等等都是走的这个路径，就是变农副产品为旅游产品，旅游产品形成产业。

最后，“袁家村模式”用股份合作的方式调节收入分配，成功解决了全体村民共同富裕的问题，从根本上保证了袁家村的可持续发展。

常见的情况是，一家挣钱，家家仿效；一个东西卖得好，人人都来卖这个东西。如果是这样，乡村旅游必然会走向恶性竞争、无序发展，难以持续。如果一个村子里只有少数人赚了钱，那就会导致村民利益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激起村民心理的剧烈波动，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始料不及的问题。村民与村民之间、商户与商户之间、本地村民和外来商户之间、投资人和村集体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利益冲突此起彼伏，势必会形成难解的乱局。

而袁家村通过适时、适度调节收入分配，逐步平衡了村民及商户的利益关系，既确保了袁家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兼顾到每家每户的个人利益。事实证明，这样的利益调整和制度安排，确保了袁家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平稳前行。

2. 产业振兴类

“村 + 公司 + 农场” 田园模式

——浙江安吉县鲁家村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水流清澈、绿树成荫的河道旁，带有数节车厢的小火车载着客人环村而过，由绿色火车皮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坐落在村边一角；大片绿色草坪上搭建起的帐篷酒店，热情地迎送着前来家庭农场观光、采摘的游玩者。

这是浙江安吉县鲁家村独有的风景——舒适现代、明净温暖、生意盎然。在这样的环境中悠闲漫步之时，你可能很难想到，2011年时的鲁家村，还是全县最穷、最脏乱差的行政村之一。短短的10年间，通过“公司+村+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鲁家村在抛荒地上建起了游客中心、生态湖，还有18个差异化的家庭农场，成了乡村振兴的全国样板村。

环境改善创“美丽乡村”

10年前的鲁家村，全村16.7平方公里范围内没有一个垃圾桶，村民生活垃圾到处扔，连村边的小河上也飘荡着垃圾；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农田山林荒废，村民人均年收入仅14700元，全村经济在安吉县居于末尾。外出闯出点名堂的人不少，但愿意回村的人罕有。眼见村子日见衰败，一些人干脆全家搬离到城里去居住。

朱仁斌，土生土长的鲁家村人，和许多村民一样，长年在外经商创业，先后从事过体育用品、瓷砖、水泥浮雕等行业。2011年初，鲁家村村委会换届改选，在组织的召唤和村民的期盼之下，朱仁斌当选村支部书记。

上任当天一查账，村集体年收入不足两万元，账上只有6000元钱，还背负着150万元外债；几天后，县里开大会，公布全县187个村的卫生检查结果，鲁家村全县倒数第一。

鲁家村的面貌急需改变。和村委会班子商量之后，朱仁斌决定从村庄环境改善着手。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垃圾处理问题。他垫付资金购买垃圾桶和垃圾箱，放置在村民家门口，要求村民们定点扔垃圾，在每个村物色妇女组长，有偿负责监督村民们的垃圾投放；又找来一对开拖拉机的夫妇，承包每天的清运垃圾工作……三个月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们往日随手乱扔垃圾的习惯也有了改变。

环境改善初见成效，借着安吉县此前推出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东风，朱仁斌决定立即着手干第二件大事——申报创建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可一计算，做这件事村里需要投入1700万元资金。钱从哪里来？对于负债累累的鲁家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的朱仁斌头脑灵活：他自掏腰包垫付60万元、盘活村里的闲置资产，筹得500多万元；紧接着，按照安吉县交通、水利、卫生等部门的政策，争取到各项涉农项目资金600万元；年末请回村的乡贤们开茶话会，聘请他们当顾问为鲁家村的发展出谋划策，目睹了家乡正在发生的变化，20多位乡贤共捐赠300万元。项目差不多可以动工了。施工过程中，遇上资金还没到位，为不影响工程进度，朱仁斌就以个人名义作担保去借款。

就这样，一边筹钱一边施工。修建办公楼，建造篮球场、幼儿园、老年活动中心；拓宽通村公路，进行亮化和绿化；通自来水，每个自然村又建了化粪池和污水处理池。就在当年，4个自然村通过了安吉县“美丽乡村”精品村的考核。新年正月，当外村人到鲁家村的亲戚家拜年时，很多人的车都开过了头——原来又脏又乱的鲁家村已经变得让他们认不出来了。有了这样的示范，剩下的自然村纷纷效仿。两年后，鲁家

村成功获得“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称号。

“家庭农场”开发智慧农业

朱仁斌明白，光有好的环境还不够，鲁家村要想变得更好，不能没有产业。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家庭农场”，这让朱仁斌有了思路：村里有1万多亩低丘缓坡，发展农场再合适不过。

村里出资300万元，聘请专业团队，对全村按4A级景区标准，进行综合规划和设计；设置18个家庭农场，根据区域功能划分，量身定制各自的面积、风格、位置、功能等，并制作成PPT，让人看了对村里的未来发展一目了然，吸引能人来承包农场。这一招果然奏效，18个农场很快就有了各自的承包人，这些农场主累计投资超过20亿元。

50多岁的朱仁元是18位农场主之一，他是鲁家村第一个返乡创业的村民，2013年，他回村办起了安吉县第一个以白茶种植为主的家庭农场。

农场发展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既要保持乡土气息、田园风光，又要通过科技赋能打造好的产品。朱仁元投入90多万元在茶园安装数据采集设备，利用物联网技术全天候采集茶园数据，使茶叶种植管理越来越精细化，实现“生产有记录、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质量可追溯”。消费者扫描产品上的二维码，就能知道从茶叶到茶杯的全过程。朱仁元还在考虑未来将VR技术引入农场，使顾客在千里之外也能通过视频看到一杯茶的诞生。

好产品只是第一步。安吉白茶品牌价值高，但朱仁元认为单纯的观光、采摘体验已不能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未来，朱仁元计划围绕茶叶加工开发精油、面膜等衍生品，开展茶技培训、研学旅游、餐饮休闲，

要让游客来了有东西可看、可玩、可吃。朱仁元打算以他的农场为龙头，带动周边村发展2000亩订单茶园，让更多茶农增收致富。

火车串联乡村旅游大景区

在家庭农场日益红火之时，鲁家村的产业开发并没有就此止步。2015年，鲁家村与浙江灵峰旅游公司签订协议，成立新的旅游公司，由对方出资2500万元，在鲁家村建设游客中心、火车站，购买小火车、电瓶车等，占51%股份；村里负责火车轨道、电瓶车道、绿道、绿化、水环境建设等，占股49%。

如今，一列小火车将18个家庭农场串联成一条精彩纷呈的景观带，统一包装、统一定价，打出“鲁家”品牌。村民的收入也不断提高：全村7000亩流转土地，平均每户的租金约为8000元；700人在自家田里就业，2017年发放工资2000多万元；100多名年轻人返乡创业，已有30余户人家将房屋改造成精品民宿，每户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还有60多人在村里开起了各种店铺。

2016年底，鲁家村成立了美丽乡村“两山”培训学院，成为浙江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党校“千名好支书”的现场培训基地。2017年7月，鲁家村入围首批国家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国家在三年内将给予1.5亿元、地方政府将配套1.5亿元的资金补助。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最终受益的是鲁家村人。60多岁的楼伯义被乡亲们称为“安吉第一位铁道工”，自从村里开通了观光小火车，他每天都要沿着4.5公里的铁道巡线，确保游客安全。这份工作给他带来每年近4万元的收入，另外还有自家土地流转的租金。“这个年纪还能在家门口赚这么多钱，真是好。”楼伯义说。

2. 产业振兴类

让贵州茶走向世界

贵州省思南县关中坝街道宋家坪村的张金明，曾是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家五口靠他一个人外出打工维持生计。2020年，在当地政府的扶贫安置下，张金明一家易地搬迁到了思南县双塘街道丽景社区。更让人高兴的是，张金明还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月薪3000多元的工作。为他提供这一难得的就业机会的，是太古集团全资子公司詹姆斯·芬利（James Finlay）2019年10月在当地投资建成的精制茶加工厂。

詹姆斯·芬利思南县精制茶加工厂位于思南县双龙大道，总投资人民币1.2亿元，于2018年开工建设，占地23,535平方米（35.3亩），初期设计产能2万吨，主要加工生产各种精制茶叶。公司希望通过在贵州创建一个可持续、可扩展、灵活的采购和供应模式，实现精制茶产销一体化，打造一条“从茶树到茶杯”的生态茶产销链，助力贵州茶走向世界。

结缘思南

贵州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低纬度、高海拔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其成为中国绿茶主要产区，也是世界顶级绿茶核心产地。寡日照、多云雾等气候条件，使得当地的茶叶不仅品质上乘，而且干净无污染，是地地道道的生态产品。

这些特质不仅使入口甘甜、回味悠长的贵州绿茶成为中国的瑰宝，还跨越国境，锁住了很多国际茶客的味蕾。在国际茶叶市场绿茶需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作为自然饮品行业的资深品牌，詹姆斯·芬利留意到贵州茶的独特与醇美，自2013年开始，与当地政府接洽，多次组织考察团赴贵州省考察，随后启动“贵州生态茶叶项目”，通过与当地茶农和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在当地开发符合国际认证标准的可持续性茶源，持续帮助贵州茶完善产业规范，走向国

际市场。

“贵州有很多特别之处，但我最看重的还是贵州出产的高品质茶。”詹姆斯·芬利董事总经理钦博凯非常看重贵州茶资源的绿色生态——贵州茶大部分来自10年内种植的茶树，土地没有受到农药和杀虫剂污染，当地政府对生态茶种植也高度重视，出台多种措施，激励茶农按国际标准管理茶区。“这正是全世界消费者都关注的核心点。也因此，我们非常看好贵州茶业的前景。”钦博凯说。

加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使得贵州偏远山区的生态茶叶产地与世界市场的连通更顺畅、更便利、成本更低，这也让詹姆斯·芬利的业务拓展与贵州茶农的脱贫致富结合在了一起。

品质为先

詹姆斯·芬利结缘思南，帮助茶农走上致富之路，同时助力当地社区的发展。而这一切要想顺利实现，不能没有对产品品质的坚持。

为了建设高品质生态茶园，詹姆斯·芬利为当地茶农提供了良好的茶叶种植实践培训，如以农药零施用为目标的害虫综合治理、在保障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提高产量以及成本管理等方面的辅导。另一方面，公司还打造了贯穿种植、采购和加工全流程的智能移动系统，并为当地茶农提供终端设备使用培训，以保障其交付的茶叶完全透明、百分百可追溯。同时，工厂严格按照公司的可持续性采购政策以及国际雨林联盟和欧盟MRL认证标准，全方位保障出产茶叶的品质，树立当地茶叶生产加工的标杆。

思南县坐落在乌江之畔。伴随着黔东北枢纽港——思南新港的加快推进建设，贵州茶从思南新港转运至重庆，进而从陆路抵达欧洲；或途经长江三角洲抵达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再销往海外。如今，美国、

英国、欧盟、摩洛哥等地的消费者都可以便利地品尝到天然醇香、高品质的思南绿茶。

社区贡献

2020年，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从2021年开始，“三农”工作的重点转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乡村振兴涉及多个方面，其中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

思南县地处武陵山腹地，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当地九山半水半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加上交通、资金等制约，产业发展一度面临重重困难。詹姆斯·芬利对思南县茶农和供应商的全方位的指导与立体化合作模式，拓宽了当地茶产业的发展前景，为思

南县地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助力。

如今，与茶相关的产业已经成为思南产业扶贫的主导产业之一，据思南县扶贫办提供的数据，截至2020年10月，思南县已经实现所有贫困村出列，全部贫困户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4.88%下降到现在的0。

张金明在家门口就成功脱贫。在詹姆斯·芬利（贵州）茶叶有限公司的数十名员工中，有10名员工与张金明一样，是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他们也已脱贫。

詹姆斯·芬利及太古集团还将在思南进行二期和三期投资建设，希望未来在将贵州生态茶带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的同时，也为思南当地借助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作出更多贡献。

3. 科技扶贫类

智能化创新破解农民“贷款难”

——网商银行利用卫星遥感和 AI 助力农村金融

在为农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网商银行发现，农村金融领域信用体系正处在建设阶段，缺乏有效抵押物、运营成本高、覆盖程度低，这使得农户很难获得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

现有的农村金融领域信用体系，从数据角度看，数据源呈现小、散、乱的特点，数据缺乏公信力。同时，农业生产经营数据获取难，数据更新不及时；从风控角度看，行业风险、区域风险差异大。数据缺乏交叉验证方式，“地在哪里？种的是什么？长得怎么样？有没有受灾及病虫害？”这些都成为授信难点。

为更好地服务三农，解决生产端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从 2019 年开始，网商银行积极探索通过卫星遥感技术结合 AI 模型算法获取可信动态数据，并创造性地将识别结果应用到涉农信用贷款模型中。

破解农村金融难题

用卫星遥感获取初步图像，并对应到地球上中国某一个省、市、县、乡和村的土地，通过获取多张卫星遥感图像，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地块过去一个月甚至一年所有的信息，把这些图像信息输入到人工智能系统里面，利用深度神经网络算法，从一系列的遥感卫星图像里面去识别出对应地块上的农作物。同时，遥感影像每个像素对应地球上的地表面积是已知的，根据图像像素的数目 × 每个像素的面积，就可以得到一个地块的实际面积。

现在，农户拿着手机，绕地走一圈，或是在支付宝上把自己的地在地图上圈出来，卫星就可以识别这块地的农作物面积、作物类型，分辨出水稻、玉米、小麦、花生、烟草等多种作物的区别。

传统的信贷金融机构，只是在农户申请贷款时关注

其生产经营状况，而通过卫星遥感，我们能获得农户历史过往所有的生产经营的记录，以及发放贷款以后的实时情况，其中包括识别作物的长势，以及考虑他们可能遭受地自然灾害、预测作物产量，因此，网商银行能够更加精准的对农户的个人信用以及生产种植行为做出评价，从而评估农户的资产。

目前，以五天为周期，网商银行需要实时更新卫星影像和识别结果，监测农作物的长势，判断作物所处的育苗期、拔节期或收割期等阶段，进而分析农户插秧、打药、追肥以及收割时期的不同资金需求。

以前，由于农民缺乏有效抵押和担保，“活”数据不足，金融机构不够了解农户，无法评定农户的信用情况，导致农村金融一直是行业难题。有了卫星遥感信贷技术的加持，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有机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五点创新

这一做法的创新点在于：

1. 图像处理技术应用：从遥感卫星上下载的数据需要一系列的遥感图像算法处理，比如云块识别，我们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自动识别，准确率达 99% 以上。经过处理后，可以得到清晰可用的人工智能算法识别影像。同时，卫星围绕地球转，每次经过地块时都会拍到一幅影像，我们因此可以得到这个地块过去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所有信息，把这些图像信息输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里，利用深度神经网络算法，从一系列的遥感卫星图像中识别出地块上的农作物。

2. 作物识别算法：网商银行用语义分割技术对遥感影像进行像素级别的农作物类别识别，语义分割算法

能标注出每一个像素点是什么农作物。奔驰的母公司戴姆勒公司联合了德国顶级的研究机构组织了 cityscapes 语义分割比赛，我们目前排名第一，二、三名分别是英伟达和谷歌。

3. 创新风控数据源。基于卫星遥感技术，我们可以获得种植作物全成长周期影像，创造了新的可信动态数据源，丰富了农户的可信数据，并可链接承载其他分散数据源建立精准全面的农户风险评估及管理体系，为“三农”客户融资风险评估增加可信数据源。基于深度神经网络、Mask-RCNN 等 AI 模型算法，网商银行建立了 28 个卫星识别模型，涵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全生长周期识别、地块识别、云块识别等模型。实现作物品类、种植面积、长势情况的识别，建立作物种植画像，了解农户贷款需求时点及授信动态管理。此外，采用大数据风控技术构建特色种植品类（果蔬茶等）行业风控模型，实现农户的精准授信，提升农户的融资效率。目前，模型准确率达 93% 以上，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4. 遥感数据多维应用，保持数据的持续更新。贷前阶段识别作物种类及面积给出授信额度；贷中阶段识别作物长势监控潜在风险，动态调整授信额度，有效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增强客户满意度。从而能够大面积提升农户的贷款可得率，让更多信用良好的生产经营农户“被看见”，可以获得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

5. 低成本、高覆盖的业务特点。遥感卫星是人造卫星的一种，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覆盖探测整个地球或指定的任何区域，沿地球轨道运行时，卫星可连续获取地球表面某指定区域的遥感影像数据。随着技术成熟，卫星遥感结合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算法在农作物识别及长势监测方面，有着准确率高、覆盖范围广、时效性强、成本低等特点。

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保障粮食生产及供应，网商银行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最先研发了全部主粮作物的模型（玉米、水稻、小麦等），当前准入的 600 万农户中超过 90% 的农户为主粮种植户，其中 80% 以上的农户是首次获得贷款准入。今年 3-5 月的春耕季，网商银行还为主粮种植户提供了 30 天免息等多项信贷优惠活动，助力春耕生产。

卫星遥感信贷技术“大山雀”已覆盖全国 1/3 的涉

农县域，在金融服务最难触达的县域和农村地区，科技银行的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打开局面。

真实的故事

1. 江西省余干县杨作波：第一个通过卫星遥感技术获得贷款的农户

距离江西省南昌市 2 小时车程的余干县，40 岁的杨作波，从 2016 年流转了村里 375 亩土地，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年水稻亩产千斤，杨师傅仍然需要为资金周转伤脑筋，而现在，他用手机支付宝的小程序描点，在地图上圈下自己的地块，几分钟就贷到了款。“以前，向银行贷款递交完材料，还要等上好几个礼拜，没想到，现在简简单单在手机圈个地，就能帮我贷到款。”杨作波感叹到。

让杨师傅更没想到的是，帮他贷到款的，其实不仅仅是地上的田，还有天上的卫星。

江西省余干县是网商银行落地卫星遥感技术贷款的首个县域，杨作波也成为了通过卫星遥感技术获得无接触贷款的第一个人。杨师傅目前已经贷款 2 万元，主要用于土地租金、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目前年收入 80 万元，净赚 20 万元左右。

2. 安徽省蒙城县郁凯：卫星遥感信贷技术首次应用于国内春耕的农户

安徽省蒙城县的种粮大户郁凯没有想到，今年春耕时，他的 1200 亩地迎来了一位“科技助手”。郁凯在手机上圈了自己的地块，天上的卫星迅速观测地块状况，几分钟时间，“天地连接”，他就获得了 29 万春耕贷款，还免除了 2 个月利息，可以用于购买化肥和租赁农具了。

春耕是农户一年之中最缺资金的时节。正如郁凯所说：“春耕最缺钱的就是种粮大户，我这一千多亩地，我走路哪走得完，从来没走全过。现在用手机圈地，网商银行用卫星就知道我的资金需求，解决了大问题！”

郁凯所在的安徽省，是产粮大省，也是率先引入该技术的省份之一。为更大力度支持春耕农户，安徽省与网商银行深入合作数字普惠金融的 16 个产粮县城，春耕的种粮大户不仅可以手机申请春耕贷款，还将最高免除 60 天利息，覆盖整个春耕时节。

3. 科技扶贫类

云上农业试验场

——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中的“工业互联网”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诗人李绅以一首《悯农》抒发了小时候跟随母亲食不果腹的艰辛生活，记录了中国作为农耕国家的历史与农民的辛勤，同时，告诫我中华儿女，享受饭食的时候，不要忘记种植的辛苦劳作。

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

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粮食供给安全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提到，截至2019年年末，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有逾1.35亿人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2020年6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政策简报中提到，受疫情影响，预计未来两年全球经济产值将减少8.5万亿美元。2020年可能陷入极端贫困的人数或高达4900万人，其中约一半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各国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等环节受到不同程度冲击，部分国家开始禁止部分农产品出口，对全球粮食安全带来极大挑战。

全球粮食浪费极大增加碳中和压力。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世界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显示，全球粮食损失和浪费现象严重，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生产至零售环节前损失掉，而零售和消费环节的浪费也异常严重。我国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从存储、运输、加工等环节看粮食损失量每年超700亿斤；从餐桌消费端看，每年浪费粮食约500亿斤。而餐厨浪费粮食处理过程中不仅会释放甲烷，还会消耗化石能源，对自然环境造成二次压力，极大增加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压力。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础。“十四五”规划中，我

国对保障粮食安全作出总体部署，首次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安全保障类约束性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予以明确。同时，规划还首次明确国家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用法律手段强制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是对我国粮食安全一以贯之的态度，更是前所未有的重视。

从中长期看，我国粮食供求仍将处于一种紧平衡态势，特别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持续增长的粮食需求，地少缺水人多的现状与粗放型种植方式，地力下降、务农人员减少与务农效益较低，快速提高的消费升级要求与农业新品种熟化缓慢等多重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我国粮食安全总体形势较好，粮食安全有一定保障，但潜在风险及产业链各环节隐患风险仍需引起足够重视。

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为数字农业

粮食安全与人类健康始终是我们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人类不断攀升的消费，推动了过度开发和持续扩大的农业生产，这就让科学有效的精细化管理手段再次成为确保粮食安全、农作物安全的焦点，同时，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也迫切要求传统农业种植与管理方式的转型升级。

数字农业将成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美国两院院士正式提出了数字农业概念，25年来，数字农业的内涵不断延伸与扩展。数字农业就是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技术、通讯和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与地理学、农学、生态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等基础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7x24小时对农作物生长环境、生长过

程的实时监测，形成有效、连续、完整的动态空间信息，利用各节点基站对数据进行洗选后上传到农业大脑对数据进行分析，结合 AI 等技术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拟合模型测算，最终形成稳定性高、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数据模型。

农业的信息化、数字化、无人化、模型化是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为数字农业，从而迈入第四产业——数据产业的重要基础。农业种植模型的标准化与可推广，是我国小农经济、作坊式农业发展转型的关键突破点，而传统农业打造新型农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是如何（HOW）且何时（WHEN）实现可量化、可复制、稳定性高的农业数据模型。以数据模型指导现代涉农工作者进行种养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作物产品质量，弥补务农人员不足，防范农业种植风险，改善生态环境。从数字农业 1.0 升级到数字农业 4.0，这不仅是一个技术升级迭代的过程，更是我国战略性、资源性产业在技术、资源、产品等环节安全可控的重大课题。

云上农业试验场

云上农业试验场将成为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中的“工业互联网”。2020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了新建“一馆一园一场”，其中“一场”就是指打造云上农业试验场。这家 2019 年边建设边运营的云上农业试验场坐落在乌镇，是国内首家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云上农业试验场，由“凤岐茶社”投资建设，开启了我国现代化数字农业 4.0 模式。

谭家湾云上农业试验场作为中国数字农业的先进成果，在世界互联网大会被国新办正式向世界推介。首家具有数字农业 4.0 属性的云上农业试验场，集合了云棚、大田、都市种植等多种农业生产场景，能够满足多应用、复杂场景的各类 AI 农业机器人实验要求。一年来，50 余种 AI 农业机器人在谭家湾云上农业试验场形成了有效数据，为农业无人设备的升级与应用积累了建模基础与实地作业经验。同时，谭家湾云上农业试验场依托自主搭建的云上农业大脑、远程 E-science 科研平台，及保驾护航的区块链追溯平台，在全国 13 个省为 3500 余家农业合作伙伴的各类作物生产，进行精准环控与全

生长周期的远程生产指导，真正实现了“种植有大脑、生长有智慧、销售有追溯”。谭家湾云上农业试验场的建设标准与管理模式已经跳出了农业应用限制，初步实现了工业级标准化与无人化。

国内首家已投入运营的云上农业试验场碳减排与碳利用实验硕果累累。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区块链等技术，不仅能够帮助农户提高对农田整体的感知能力、更科学决策日常操作行为、减少重体力重复性劳动、提高劳动效率以解决农业生产人力不足的问题，还能够在育种栽培、土壤改良、智慧农业生产管理等各环节的碳减排与利用方面，提供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谭家湾云上农业试验场约 10 亩中空玻璃架构云棚内，部署了 300 余个各类传感器采集单元，上百个物联网节点，五大类 40 多个 AI 机器人、20 多个边缘计算节点，是国内首个 5G 微基站全覆盖云棚，架设了环流风机、湿帘、抽湿机、除湿机、热风机、喷雾降温等各类下行自动执行设备，能够实现对二氧化碳浓度、空气温湿度、光照度、有效光合等 20 余项传感器要素的精准、实时数据采集与在线监测。有算力的数据通过云上数字农业大脑，根据数据模型来自动控制各种下行执行设备，让作物生长在最适宜的环境中。

通过对谭家湾云上农业试验场云棚内 8 种西红柿，7 个月的全生长周期的精准环控与数据模型指导生产，实现了零化学农药使用量。与此同时，升级改造跨地区接入云上农业试验场的山东东营及寿光某云棚的同类作物种植，农药使用量分别减少了 48% 与 35%，农业用水量分别减少了 65% 与 90%，农业用肥成本分别减少了 40% 与 80%，切实实现了从种植源头减少了碳排放。

与此同时，云上农业试验场在云上农业大脑的支撑下，将二氧化碳传感器、光照度传感器、环流风机、蓝宝石二氧化碳喷施等系统进行联动，利用数字技术精准监测与获取作物空间的碳饥饿和碳饱和数据，通过精准实现温室环境中二氧化碳数字检测与管理，通过适时均匀、动态、精准地释放二氧化氮气肥，稳定云棚内二氧化碳浓度，加强云棚作物光合作用，不仅促进作物根系发达，提高作物抗倒伏能力，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干物质含量及含糖量，延长储存时间，更实现了西红柿平均增产 30% 的可喜成果。

新农村、新农业、新农人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农业是我国打造有中国特色新农业的重要发力点。大力发展数字农业产业，推动我国数据产业的发展，要以工业发展思维为引导，鼓励适用于我国农业复杂生产环境的科技创新技术，搭建有助于全产业链技术熟化的综合性云上农业试验场，着力在耕、种、管、收各环节为涉农企业与农户提供科学种植指导方案、

提升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产量与质量。

通过种、收、加工与销售环节的全程可追溯与虚拟可视化，加强数字农业产业链上的各利益相关方信息透明度，极大降低生产的不确定性与人为因素，从种植源头减少碳排放，增强碳利用能力，以确保农产品健康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化解“靠天吃饭”的高风险和散、乱、小的无序低效状态。

(作者：袁娅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 董事会秘书 / 高级经济师)

3. 科技扶贫类

极飞科技：乡村振兴中的精准“科技力”

广州极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07年，是世界领先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公司，致力于用科技为农业赋能，以“提升全球农业生产效率”为使命，将无人机、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带进农业生产，逐步构建起无人化的智慧农业生态。

智慧农业产品线助农户增产增收

2013年，极飞改变农业的梦想就开始在新疆的棉花地里扎根，并在2014年来到新疆设立了研发中心，探索无人化的棉花种植。随着ALL IN农业的深耕和全力发展，迄今为止，极飞已经自主研发并制造了极飞农业无人机、极飞农业无人车、极飞农机自驾仪、极飞遥感无人机、极飞农业物联网和极飞智慧农业系统这六大智慧农业产品线，贯穿农业生产中的“耕、种、管、收”各环节，产品服务覆盖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等大型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并且在果地、茶林等多样化的农业经济作物中投入使用。

其中，极飞的农业无人机和无人车能够帮助农民精准、高效地完成播种、撒肥和施药等多样化场景的农事作业；在农机自驾仪的改造下，传统大中型农机也能实现精准作业和自动驾驶；通过农业遥感、物联设备以及智慧农场管理软件，农民可以轻松地利用大数据分析 and AI 辅助决策来管理农田。

极飞的这套无人化农业智能管理方案已经成功应用在了江苏的大中农场、洪泽湖农场和方强农场等大型农场中，对农场的农艺、农事、农资、农机进行科学管理，帮助解决大农场劳动力成本高、生产管理粗放等问题。

江苏大中农场是国家大型绿色食品生产企业和有机大米生产基地，耕地面积7.5万亩，主要种植水稻和大小麦粮食作物。大中农场在2019年3月首次

引进极飞的智慧农业解决方案，利用极飞遥感无人机进行农业测绘与智能巡田、结合极飞农业无人机进行自动化精准种管，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地块管理质量和效率，实现粮食的均匀增产。数据显示，大中农场在2019年的水稻、小麦亩单产较2018年增产近150公斤。

根据2020年近一年的种植试验结果，大中农场当年的小麦整体产量提高了198万公斤，被江苏省农业技术部门和农业专家们称为“小麦标准化种植的教科书”。此外，借助极飞智慧农业系统的精准管理，大中农场有效节省了100多万元的农药使用成本；农机调度的更加高效合理，也将机械油料的损耗成本降低近100万元。

除了小麦领域的标杆案例外，在棉花上的深耕极飞也一直不遗余力。2021年4月22日，极飞还在新疆尉犁县启动了国内首个无人化棉田管理项目——“超级棉田”。来自极飞科技的两名90后员工，将借助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来管理这3000亩棉田，以探索和证明极飞的智能化、数字化管理模式可以帮助未来的新疆棉农进行大规模的无人化农田管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提升棉花的品质，降低棉花的生产成本。实地调研数据显示，一亩棉田的收益大概能达到1800-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棉农的投入超过了1600元。在这1600元的投入中，人力成本及水肥管理成本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而这些成本都可以通过极飞的无人化技术和精准农业技术大幅降低，实现用更少的投入换取更高的产出。

随着极飞智慧农业生产工具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小农户选择了极飞农业无人机，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帮助他们提高了农业种植收入。广东江门台山赤溪镇村民郑奕辉是返乡台山使用无人机飞播的第一人，成功从一名外出打工者转型为科技新农人，年收入也从务工时的十万元增至四十多万元。他坦言到：“以前

使用人工和插秧机，最多种 200 亩，需要家里 5 口人一起上阵，还要请人工才行，现在用极飞农业无人机播种、打药、施肥，效率大大提高了，我承包的 700 多亩水田，只需两个人就能管理得过来，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一亩水稻能够增收约 100-200 元，每亩利润可达 600-700 元。”



· 极飞农业无人机在田间播种

自动化精准喷洒

基于行业领先的农业人工智能技术，极飞通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状态、准确识别目标区域和施用用量，为农田病虫害提供个性化、精细化的管理“处方”；开创性的离心雾化喷洒技术结合厘米级精度的 RTK 定位导航系统，真正做到“哪里需要治哪里”，从而减少农业用水、节省农药化肥的使用，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减少投入成本。如在过去，新疆的棉农主要采用拖拉机来喷洒棉花脱叶剂，但这种方式不但会压坏大量棉花，而且费水、费药，造成土地污染，严重影响棉花产量和质量。

极飞自 2016 年起就开始在新疆组织大规模的农业无人机喷洒脱叶剂作业——“秋收起翼”，精准、均匀、高效的无人机喷洒技术不会重喷、漏喷，也不会造成棉铃脱落，大大提高了棉花生产的效率、质量和产量，降低了棉花生产成本。截至 2020 年 10 月中旬，极飞农业无人机在新疆累计作业 2.16 亿亩次，棉花脱叶剂作业面积占到新疆机采棉面积的 75%，而 2020 年新疆的 3700 多万亩棉田的机械化采摘率已经达到了 70%。



· 极飞农业无人机喷洒棉花脱叶剂

极飞通过精准定位喷洒技术和投放用量的控制减少粮食、水果等农产品生产各环节的化学污染，减少农药残留。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我国农业无人机总体可减少农药使用量 20% 以上、节省用水 90% 以上、提高农药利用率 30% 以上。

通过农业物联网建立农产品的透明可追溯系统，让农产品的质量可以被看见；对此，极飞提出了以可持续生产模式为基础的“明日餐桌”计划。在“明日餐桌”计划的倡议下，极飞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服务农业生产，帮助农民降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实现绿色生产及精准溯源，保障人们餐桌上的食品更健康、更营养、更安全。此外，极飞还与陶氏杜邦、拜耳等知名农药生产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开发绿色环保、并适用于无人机喷洒的植保药剂和植保方案。



· 用水敏纸检测无人机果树喷洒质量和农药利用率

极飞在为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保驾护航的同时，也关注人身的安全与健康，在产品的研发上更注重安全性和人性化，致力于为用户打造安全的农田作业环境。

传统的人工施药方式将农民置身于农药喷洒的环

境之中，容易引起农药中毒。为了保护农民免受农药危害，极飞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了产品的研发和细节设计之中。极飞的农业无人化设备能够实现全自主作业，能让农民远离危险源；极飞的智能灌药机装置能最大程度减少人与药物的直接接触，用蓝牙连接智能药箱，自动完成灌药和换药环节，实现真正的人药分离；极飞学院还定期制定并及时发布产品使用流程规范，避免用户因设备操作不当而引发危险。



· 极飞农业无人机喷洒棉花脱叶剂

培养农业人才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方向，也为乡村“新农人”提供了专属的发展舞台，“田创客”“农秀才”“土先锋”的不断涌现，让社会各界看到了“新农人”的风采和乡村的活力。而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也离不开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并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农人不只是会种地，更要懂技术，会经营，见多识广，能够进行规模化经营，懂得如何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

极飞科技在致力于农业无人化技术和产品推广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农民的可持续发展。

2016年，极飞科技创建了新型知识分享平台极飞学院，通过线上线下教育的方式让农业生产者快速

掌握智能设备的操作和现代病虫害防治方法等技能。极飞学院在线上通过“极飞公开课”、“极百科”和“极名家”等栏目邀请农业科技专家和实践者分享成果；在线下则利用遍布全国各个省份的培训网点提供全方位无人设备操作培训与资质认证。

极飞无人化技术的发展还打破了农业生产中的性别限制，使得农村女性也能够深度参与农业生产。极飞学院的农业技能培训能够帮助农村女性通过专业能力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地区性别平等。



女飞手使用极飞农业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

截至2020年末，极飞学院已经累计培养智慧农业人才91025人，帮助农村青年转型为无人设备操作员、农业服务与管理专家等角色。农村数字基础的发展还催生了无人机飞手、数字设备管理员等新兴工作，为农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并且随着智慧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归农村，让农村成为了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今年，极飞科技还投资2000万，启动了新一轮的“30万科技新农人培养计划”，向农业一线输送一批“懂科技、会经营、爱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有志向、懂技术、会经营、敢闯敢干的农业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也将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引领农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4. 金融扶贫类

国海证券“四级联动”助脱贫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打造“党建驱动、基础推动、扶智促动、产业带动”的“四级联动”工作体系，扎实开展精准帮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聚焦长效发展， 定点帮扶成效显著

国海证券定点帮扶的百色市阳圩镇六丰村以“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思路，充分发挥国海芒果示范基地的带动和示范效用，带领全村改变传统的种养模式，优化产业发展，2021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6万元。

六丰村搭建的“六丰拾贝生态农业中心”的电商平台，开通了一条农产品销售的“高速路”。作为右江区首个电商服务站，相继开发数十个产品，有效带动阳圩镇18个村抱团发展，给全镇村集体经济增收83万元，带动贫困户就业创业180人。

近年来，通过公司投入和争取财政扶持资金方式，国海证券向定点帮扶村投入资金3500多万元，有效

支持了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书写了一份高分答卷。六丰村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广西壮族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首批示范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区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二、消费帮扶助内需， 促进产业做强做大

国海证券积极发挥地域广、客户多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消费扶贫，为定点帮扶点和“一司一县”对口帮扶县的产业振兴注入了活力，激发了动能。

2021年以来国海证券及员工参与消费扶贫的金额共计200万元，使得帮扶村村集体的经济净收入达到23万元以上。同时，通过消费扶贫促进了帮扶村产业发展，一个个产业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产业从粗放式管理走向精细化、科技化管理，减贫增收效益显著。

三、学党史办实事， 持续打造乡村振兴公益助学样板

2021年国海证券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切入点，积极践行为民办实事。一是开展爱心圆梦活动，捐资19.3万元资助39名家庭困难的大学生走上大学殿堂；二是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合作开展“母亲邮包”公益项目，资助公司定点帮扶点和“一司一县”脱贫户620户，每户发放价值300元共计18.6万元的母亲家庭健康包；三是开展公益活动，捐资18.2万元为定点帮扶点和“一司一县”帮扶点建设图书角和捐赠课桌椅，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

4. 金融扶贫类

国投创益： 基于 ESG 理念的产业扶贫投资

自从 2014 年开始从事产业扶贫投资以来，国投集团下属的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创益”）已经投了近 200 个项目，在该公司副总经理刘云的心目中，对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即俗称的“斑布”）的投资是其中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

斑布公司总部位于四川成都，是国内本色纸的龙头企业。国投创益于 2020 年领投该公司之后，已在四川省青神县投资建设 20 万吨生产线，带动了当地就业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国投创益引导斑布大规模发展四川贫困山区的慈竹资源。斑布团队已联合青神县瑞峰镇尖山村、天池村及周边贫困农户创建“青神县龙大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开展竹林基地建设工作，组织、培训当地农户，按照标准种植、抚育、浇灌、施肥，按照竹林丰产技术指南严格执行竹林种竹。目前，斑布已经建成自有竹林近 4000 亩，并在该地区形成了近 3 万亩竹林基地的青神小竹海。

对斑布的投资十分符合国投创益以 ESG（环境、社会、治理）为导向的投资理念，截至目前，该项目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扶贫、环保），同时在基金的保本增值方面也有较好的前景。

让社会效益更持久

国投创益因扶贫而生，因责任而立。其第一只基金成立时，就定位为专门服务于民生类的基金，与国投集团的基因一致——为国而投，投资服务于国家战略。基金成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追求社会效益（扶贫），二是基金保本增值。首要目的是扶贫，要探索一种市场化的产业扶贫模式。

“这种投资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没有直接的经验，所以当时从章程设计上是鼓励探索，尝试走一

条新路。”刘云说：“从这几年的过程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逐渐摸索到了一种成熟的模式。”

从 2014 年正式受托管理第一只基金开始，国投创益的产业扶贫投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创新探索，到转型，再到后来逐渐寻找到一条明确的路径和模式的过程。

最初，社会上对这种性质的投资不太理解，更多的是认为它与传统的扶贫资金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换了个名字而已。地方上的很多企业，包括地方政府，都认为投进来的钱是用来扶贫的，那就先用了再说，以后谁也不知道会怎样，说不定政策又变了呢。而作为基金管理者的国投创益公司，对基金未来如何退出也没有考虑得很明确，这就导致后来要退出时出现障碍。

2015 年第一批投资的企业，后来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因为市场发生变化，或者是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企业经营遇到了问题。国投创益曾投资过园林企业，当时很多地方都在搞城镇化改造，地方政府上了各种工程改造项目，国投创益判断，城市绿化需要大量的树木，市场需求大，又是政府买单，前景应该会不错。没想到，不久之后政策变了，不允许地方再搞大基建，很多园林企业的经营一下子就难以为继。尤其是在贫困地区，民营企业融资本身就很难，有什么风吹草动资金立马就会出问题。

另一种情况是，企业自身发展得还不错，但是当国投创益提出来要求退出时，却遇到了障碍。当时退出主要是靠大股东回购，大股东说自己的钱都投进去了，没有钱做回购，如果资本要撤资，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

有了这样的教训之后，国投创益开始认识到，基金投资还是要回归本质，必须要退出。“不退出，就不叫基金投资，更何况我们的两个基金存续期都是 15 年，

15年要求滚动投资，如果不能退出，那还怎么滚动？”刘云说。

于是国投创益开始做出一些调整。一是借船出海，和大型龙头企业合作，龙头企业有实力，业务发展之后资本才能顺利退出，之后又尝试走证券化道路，并逐渐明确了思路：基金投资，最佳的退出方式就是资本市场，其次是并购退出，最后才是大股东回购。

国投创益早期找项目，先看社会效益，然后才是经济效益，但是后来越来越意识到，社会效益的实现其实是依附于经济效益的。企业带动扶贫的效果是不是可持续，要看它自身的经营发展，如果自身经营都成问题，它怎么能带动别人致富呢？所以，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如何，就成为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到后来国投创益的目标越定越高：企业要有上市预期，在这个基础上，社会效益才能够发挥得更持久更有效。

用 ESG 理念引导企业

现在，国投创益的投资模式基本上已经比较成熟了，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到2020年，国投创益的投资项目带动就业人口约30多万人，这些就业人口每年获得的收入有40多亿元，整体撬动了近3000亿元社会资本投入。300多亿元规模的基金撬动了3000亿元，近10倍的撬动能力，对于脱贫攻坚的贡献比较显著。

国投创益投资了国内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牧原股份，引导其在山西、内蒙等8个省份的贫困地区投资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共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60万人致富。

国投创益还投资了万魔声学，将深圳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到湖南炎陵县，制定“公司+贫困户”的员工招聘政策，优先选聘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对贫困户员工进行长期的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已带动就业2500人，本地员工占90%，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占17%。该公司还积极参与社会募捐、技术培训扶贫、爱心助学等精准扶贫活动。

当初，为了统计投资项目的扶贫效果，国投创益曾邀请人大、北师大等高校扶贫研究院协助设计了一套

社会效益衡量指标，后来在与一些龙头企业合作去贫困地区投资时，国投创益也引导合作企业运用这套指标。

通过对这套指标的应用，国投创益已经有了一个闭环的信息采集体系。在尽调环节，就开始用这个指标体系；在投决的时候，协议里会有补充协议，约定资金如何使用，企业必须要带动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等；投后还会根据这个体系来评估检查项目的进展。

从2019年开始，国投创益开始考虑：在脱贫攻坚完成之后，如何将这套指标转化应用于乡村振兴？在与中国基金业协会沟通时，国投创益接触到了ESG，并且对ESG的理念十分认同。

国投创益原先的社会效益指标，与ESG的S（社会）其实很类似，而对于E（环境），国投创益之前在评估投资项目时，就很关注环保，对于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项目一票否决。

而对于G（治理）的重要性，国投创益的体会也很深。他们早就意识到，投资一家企业，除了成长性，治理很关键。早期投资的一些家族企业，有的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治理。这样的企业后来的发展往往不如人意。而相比之下，有治理理念的企业，经营情况都比较正常，基本上能够实现公司的投资预期。所以，国投创益已经将企业治理当作投资决策的一个标准。

鉴于ESG理念与公司的投资理念如此契合，而且公司之前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运作经验的积累，于是国投创益就率先尝试将ESG指标引入到一级市场，作为项目投资的重要考量因素。

“现在的企业，包括很多民营企业，只要经营情况正常，他们也认为自己要履行社会责任，做国家需要做的事情，这样既有安全感，也有荣誉感。”刘云说。现在，在对项目做前期调研时，国投创益就会关注项目与ESG理念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会继续推进合作；如果不一致，就会放弃。

投资斑布——基于共同理念的合作

作为一家投资机构，除了能给企业以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还要用先进的理念引导企业，这是国投创益应用ESG的一个重要原因。刘云说：“其实很多企业

都或多或少是这样在做事，但是他们没有系统的梳理，或者是没有想到，做这样的事情还能够给企业创造价值。所以我们要从理念上对企业进行教育，他们会觉得很有收获。”

对于斑布的投资，就是缘于国投创益与企业家之间理念上的沟通与认同。

斑布的业务是以竹子为原料制造生活用纸。四川多竹，以竹为原料造纸，这是对本地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竹子造纸的过程中没有污染，不像木材造纸污染很大；斑布的纸都是原色纸，不用漂白，也有利于环保。

在环保方面斑布颇有亮点，而且当时公司的业务发展也势头不错，不少机构都有意投资斑布。斑布董事长有一次在某个场合听说了国投创益的投资理念，比较认同，于是就主动找上门来沟通，刘云向她详细介绍了 ESG 投资理念。斑布的业务发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 ESG 理念，只是他们之前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听说过 ESG。斑布董事长很高兴，对刘云说：你们

的投资理念，与我们现在做的，以及我们所追求的，都非常一致。我们公司一定要让你们投，而且由你们领投。

国投创益的资金投入让斑布的业务发展又有了新的动力。国投创益还向斑布建议，可以将一部分广告宣传费用转用来做公益，这样做很有意义，并且同样能起到品牌传播的效果。

随后双方联合行动，针对四川贫困地区青春期女孩普遍面临“月经贫困”问题，发起了名为“扶起新梦想·关爱她”的公益活动。2020年11月27日，首批捐赠物资到达凉山州昭觉县的昭觉中学，斑布及国投的志愿者伙伴向女学生分发健康卫生用品。志愿者还为同学们开设了一节健康护理小课堂，对在青春期可能遇到的生理健康问题进行解答。

首批捐赠的 7000 箱卫生用品，在捐赠活动当日已经发往四川省最后七个脱贫摘帽县。后续斑布与国投还将研究长效机制，为这七个县的困难女生解决卫生用品短缺的问题。

4. 金融扶贫类

Visa 金融教育助力 1000 万村民

金融作为经济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是中国农村精准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仍有 17 亿人无法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的不足，成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和小微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农村人口由于其自身金融知识不足、金融能力较差，制约了其自我发展能力，难以真正实现“造血式”脱贫。

Visa 是全球领先的支付技术公司，成立 60 余年以来，始终坚守企业的使命，即通过创新、可靠和安全的数字支付网络连接世界，助力个人、企业和经济的蓬勃发展。Visa 坚定支持个人和企业，并藉此为当地社区和整体经济带来切实可见的收益。除了通过普及数字支付帮助个人、企业与经济实现具体可衡量的收益外，Visa 还投入大量资源，在全球释放积极的社会影响力。Visa 相信包容性经济可以使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得到提升。

2016 年，Visa 在中国启动普惠金融战略，目标是五年内惠及一千万农村居民。过去五年，Visa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洞察需求侧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与面临的挑战，分享研究成果、国内外最佳实践案例与经验，积极建言献策，赋能涉农干部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面向农村居民普及金融知识和科技应用，整合多方资源，形成集合影响力。

到 2020 年 9 月，通过支持并参与中国人民银行“金惠工程”、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川产业扶贫等项目，Visa 提前实现惠及一千万农村居民的目标。

项目亮点

1. 深入调查，为脱贫攻坚建言献策

2016-2018 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Visa 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在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建设“中国普惠金融及教育‘金惠工程’

国际示范区”（下称“国际示范区”，其中包括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的 33 个国定贫困县，黑龙江 8 个省级贫困县）。双方在 2016-2017 年首先开展了深入的基线调研，对连片特困区的农村居民在融资管理、数字账户与支付、家庭日常金融管理与决策、金融教育等方面金融能力的现状进行实地调查，同时采集和总结农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等信息，获得对需求侧的深入洞察。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与吉林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的支持下，基线调研最终形成《连片扶贫区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现状分析报告（2017）》，这是国内首份深入分析特困地区农村居民金融能力与金融素养的报告，对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与金融素养，探索金融扶贫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2. 推动基础研究，倡导协同合作创造集合影响力

在中国推动金融教育和普惠金融发展的进程中，Visa 秉持包容与开放的态度，积极与多家伙伴合作；分享自身的实践经验，支持伙伴的基础研究，积极倡导多方协同合作，共同创造集合影响力，助力中国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与包容性增长。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Visa 携手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在过去多年积极支持江西省金融学会、湖南大学、吉林省农村金融改革研究中心、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等开展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研究，例如《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机制构建与政策创新》《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等课题。

2016 年，Visa、中国人民大学与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这是国内首个专注于普惠金融研究的智库。Visa 与中国金融普惠研究院合作开展了金融普惠研究、普惠金融基准/家庭

调查、普惠金融绿皮书、数字普惠金融培训等项目。Visa 连续五年支持并深度参与其主办的“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双方合作从倡导、研究与传播等多个维度推动中国普惠金融政策与实践的发展，推动中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基于多年来在其他国家开展金融教育和普惠金融的经验，以及在中国与合作伙伴的创新探索，Visa 积极地通过行业倡导平台分享这些研究和项目发现。Visa 先后于 G20 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GPFI）会议、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以及吉林省农村金融改革长白山论坛上分享国际最佳实践与经验，提出政策建议，并倡导各方协同合作创造集合影响力。

3. 赋能基层，助推数字农村经济转型

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金融系统自身的努力，更需要与政府各级部门和各方的通力合作。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指导下，遵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 - 2020 年）》的原则，Visa 与合作各方在项目地赋能基层干部与农村金融服务提供商，助推数字农村经济转型。

在“金惠工程”项目中，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导，联合当地政府，Visa 投入大量时间、才智和资金予以支持，对处于贫困地区的县、乡镇领导干部进行针对脱贫工作急需的金融知识培训，提升基层带头人的金融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金融扶贫政策与工具，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当地金融机构也广泛参与到项目中，发挥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志愿者的优势，通过分层级的志愿者赋能培训，也提升了地方的从业者专业技能。

4. 智志双扶，金融教育助力 1000 万农民奔小康

Visa 积极响应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意见》，根据贫困地区金融消费者需求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活动，在贫困地

区支持并参与农村金融教育“金惠工程”的实施，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素养和风险责任意识，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项目成果

2016 年 -2020 年底，Visa 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教育项目惠及超过 1,080 万农村居民，其中包括超过 904 万名农牧民，90 多万名农村中小學生及接近 12 万名农村教师，近 40 万县乡镇村干部和超过 37 万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金融教育项目效果显著，首先体现在覆盖面广泛；其次，受益人金融素养有明显提升，农牧民学会使用存折、银行卡来存钱，了解了个人征信的重要性，学会了预防金融诈骗等知识；第三，创建了一支专业志愿者对外和社群；第四，金融知识可及性提升。宣传的主要目标是让民众了解金融概念或业务的名称，并让他们知道可以去哪里咨询；第五，填补基础数据空白。国际示范区的基线调查成果《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农村金融能力分析报告》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基于 19 个县的调研数据分析形成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创新——以贫困地区为例》，为项目优化乃至有关部门制定提升农村金融能力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2020 年在对原国际示范区开展追踪调查时，66.41% 的项目受访者表示掌握了更多金融知识，54.67% 的受访者表示对金融服务有了更多了解，21.96% 的受访者参与“金惠工程”项目生活得到了改善，获得了金融福利。

2016-2018 年，Visa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及中和农信合作在内蒙古自治区试点推广移动互联网金融教育项目，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新模式，累计举办金融教育场次 209 场，参与人数达 10740 人，其中女性占比为 63%，农户占比 95%。项目惠及一万余家庭，共有 4.4 万余农牧民从中受益。

5. 健康扶贫类

帮助乡村儿童看清世界和未来

——依视路“睛彩童年”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一个来自云南施甸县双隆小学的9岁小女孩，第一次参加专业的视力检查，经过医生和志愿者仔细地检查和验光后，发现她已经是600度高度近视且双眼弱视。小女孩特别地伤心，不断地用衣袖擦拭着眼泪，无声地抽泣。

藏族小学生平措次仁在西藏日喀则县热索乡小学读六年级，一年级时就配了远视眼镜，到了三年级跟爸妈说戴眼镜头晕恶心，爸妈说等他六年级再带他去看医生，这期间眼镜摔坏了家里也没给再配。从那之后到现在，他上课上学放学都没有了眼镜，也就没有安全感。因为长期不戴眼镜，如今他裸眼视力只有0.1/0.15，远视度数高达1250度，并引发远视性弱视。

这样的例子，在高原和中西部偏远地区绝不是个案。若不是作为志愿者参与了“睛彩童年”公益项目开展的活动，依视路的很多员工都以为乡村孩子的视力或许要优于城市的孩子。

据江孜县卫健委、教育局2020年对全县6500多名中小學生初筛统计，整体近视率可能在60%左右，甚至超过了全国平均值。

2020年，施甸县教体局在10个乡镇抽查了约两万名学生的视力情况。抽查数据显示，2020年施甸县学生的平均近视率为52%，中学生的视力不良比例高达75%。

西藏江孜县与云南施甸县学生的近视情况是全国乡村学生近视现状的缩影。很多人都认为乡村儿童的视力或许要大大优于城市的孩子。其实，在我国云南、青海、西藏等地区，常年阳光炽烈，户外的强光、紫外线、普遍不足的室内照明和缺失的眼健康教育，使得这些地区学龄儿童的眼健康问题尤为严峻。尤其在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由于基础眼科筛查和诊疗资源不足，很多孩子的视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发现和诊治，视力问题同样很严重，近视防控也刻不容缓。

关注乡村儿童视力健康

眼睛是人体最重要的导航系统，超过80%的外部信息是通过眼睛接收的。视力问题若不能及时矫正，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依视路集团是一个有着170年悠久历史的跨国企业，作为一家百年企业，它有着清晰的使命，那就是通过改善人们的视力，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为此，依视路集团自2008年起相继在美国、印度、新加坡、加拿大等国成立了依视路视力基金会。2016年9月，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上海依视路视力健康基金会正式成立（以下简称“依视路视力基金会”）。自成立之日起，依视路视力基金会便成为一个开放透明的视觉健康公益平台，通过和社会各方合作，汇聚全社会的爱心和专业力量，消除贫困人群的视力不良问题，让他们的生活因此得以改善。

我国近视防控任务艰巨，乡村情况尤甚。如何让生

活在偏远地区的乡村儿童青少年视力问题得以改善，成为依视路视力基金会的工作重点。

“睛彩童年”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由依视路视力基金会发起，关注乡村儿童视力健康，通过为需要视力矫正的乡村儿童捐赠有品质保证的光学眼镜、专业的验光配镜服务、视力健康知识宣传和普及，改善偏远地区儿童所面临的视力健康知识空白、就医难、配镜难的困境，实践视光普惠，让乡村儿童也能享有看得清的权利。

“睛彩童年”在云南



2015年初开始，依视路视力基金会开始和“点亮眼睛”公益组织合作，共同在云南省开展视力健康公益计划，至今已连续合作六年。六年来，“睛彩童年”公益项目已走进云南香格里拉、云南保山市龙陵县、盈江县、施甸县、昭通市巧家县、楚雄州禄丰县等二十多个县，为1000多所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开展视力健康促进项目，通过为学校培养爱眼大使，指导爱眼大使们组织学校视力健康讲座和视力初筛，并组织医生进入学校提供专业验光、配镜，为当地的孩子提供全面的视力问

题解决方案。

2021年5月17日-21日，“睛彩童年·点亮施甸”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项目在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圆满开展。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志愿者为施甸县仁和镇19所学校、姚关镇10所学校共计近2000名中小學生进行了专业全面的眼底检查和验光，并为其中查出需要配镜的约1500名学生提供免费配镜服务。

“睛彩童年”在西藏



2020年9月，“睛彩童年”公益计划来到了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地处藏南高原，平均海拔高达4300米，年平均日照时长高达5000个小时，紫外线强烈导致各种眼病高发。加之该县居民98%都是藏民，从事农牧业为主，长期以来对孩子视力保护重视不够，包括家长自身对视力的防护意识也非常薄弱，更不清楚自己孩子是否近视、是否需要配镜等等，这直接影响了孩子的视力健康。孩子的近视问题，成了当地脱贫摘帽之后，政府有关部门和上海对口支援江孜工作小组，亟待解决的一项重点难点问题。当地学生有了学习的机会，不能让视力问题成为扶贫扶智路上的绊脚石。

2020年9月16日-28日，“睛彩童年·点亮江孜”公益项目在江孜县顺利开展，共计为江孜全县19个乡镇的2822名中小学生开展眼健康服务，覆盖了江孜县所有初中及小学5-6年级所有视力有问题学生。检查项目包括医学验光、电脑验光、插片验光、眼轴测量、眼压眼底等检查，预警视力不良问题，并为其中2139名患有屈光不正的孩子免费配镜，以帮助孩子们重见清晰“视”界。这次在江孜开展的公益行动与江孜县卫健委精准对接需求，助力改善广大江孜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为江孜、西藏乃至全国的健康扶贫工作贡献力量，有效巩固江孜县脱贫攻坚成果。

“睛彩童年”在青海藏区

2018年，依视路视力基金会开始关注高原地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在青海省的三江源地区开展“睛彩童年”公益项目。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由于紫外线照射强烈、落后的医疗条件及防护意识的缺乏，当地学生的视力存在着诸多问题。三年来，“睛彩童年”已在青海省玉树地区为6000多名儿童青少年进行视力筛查，公益配镜近2000副。

从2019年开始，“睛彩童年”还携手“看见爱”公益机构在青海省开展儿童视觉健康教育促进项目，帮助边远地区儿童及其家庭提升眼健康卫生知识。三年来，该项目已在青海海西州乌兰县、果洛州玛沁县、



玉树州曲麻莱县持续开展眼健康早期干预活动，为当地5000多名低龄儿童进行了爱眼、护眼知识科普，同时捐赠了5000副儿童太阳镜，为当地儿童提供高原视力防护。

从2015年开始，“睛彩童年”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已在全国27省市自治区落地实施，为学生、家长和老师举办爱眼护眼公益讲座超过1500场，为250多万儿童青少年提供视力筛查，并为其中超过20万名贫困学生捐赠公益眼镜。

5. 健康扶贫类

培训乡村医生 改善村民健康福祉

——康宝莱“营养零饥饿 - 乡村医生项目”

乡村医生是农村卫生工作的主体，是我国保障农村人口健康福祉的基础力量，肩负着农村医疗服务和预防保健的重要任务。乡村卫生院是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最基层组织，承担着为农村群众提供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多发病、一般常见病初级诊治的职责。但目前大部分的乡村医疗条件不足，乡村医生专业能力有待提高。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要求乡村医生至少每两年接受一次培训，参加一次考核。我国现有乡村医生超过 90 万人，乡村医生培训主要是县级卫生部门组织的线下培训，且一般都是收费式、强制性的。

康宝莱公司推出的“营养零饥饿 - 乡村医生项目”，结合公司的专业所长，将“关注和努力改善弱势人群的营养与健康问题”的公益使命与“精准扶贫”“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通过与权威机构合作开发乡村医生在线职业培训课程、与地方政府共同援建博爱卫生站、捐助移动医院服务包多种方式，从能力提升和设施改善两方面入手，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助力完善我国乡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善村民健康福祉。

“营养零饥饿 - 乡村医生项目”从 2019 年开始，至今已捐资近 660 万元用于培训 1500 名乡村医生，援建 13 个博爱卫生站，捐助 16 个“移动医院服务包”，预计超 20 万农村居民从中受益。

三管齐下助乡医

该项目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作，基金会负责项目的设计和运营管理，康宝莱结合公司的业务地域，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选择符合条件的贫困村作为项目点。康宝莱各区域员工在项目过程中提供一线的监督

和督导，并组织志愿者到社区提供相关志愿服务。项目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 乡村医生在线培训

通过高质量的线上职业培训支持乡医能力提升，助力乡村医生职业发展。项目委托中华医学会组织专家学者，开发定制了 100 课时线上乡村医生职业培训课程。课程包含：社区卫生、临床常用技能、临床适宜技术、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精神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并首次将营养膳食的健康内容纳入乡医培训课程，共计 10 个模块。学员在完成培训模块后，均可以申请国家继续教育 II 类学分 5 分，支持进一步进行助理医师资格的申请与考试。

为保证项目质量，由专业机构及专人负责学习跟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可通过各省省级红十字会触及全国乡村医生，同时，培训平台配备专人客服，乡村医生学员注册登记后，平台管理员 / 客服将定期通过后台、微信推送触达、群组管理等模式运营管理该平台，确保学习的有效性。

2. 援建博爱卫生站

项目与当地政府合作共同援建博爱卫生站，由项目出资建设卫生站的主体结构，当地政府提供土地及配资购置医疗设备，从硬件上助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完善，为当地社区提供更加优质、标准化的医疗保健服务。截至 2021 年 10 月底，已有 2 所卫生站投入使用，年底预计有 4 所卫生站完成建设。

卫生站作为当地开展健康科普知识的基地，支持乡村医生在当地开展健康、营养等方面的科普活动，就近的康宝莱员工和服务商志愿者也定期到卫生站为当地村

民普及健康和营养知识，提升当地居民的健康意识与健康水平。

3. 捐赠“移动医院”服务包

移动医院服务包移动创新整合了血糖仪、血压计、血氧仪、血脂和血红蛋白分析仪、尿酸胆固醇分析仪、心电、超声、电刺激治疗仪等十余种终端仪器设备，专门针对偏远地区的医疗和健康需求所开发可基本满足偏远地区居民建档、体征指标检测、慢病随访、医疗数据快速对接等常见的医疗需求；也可用于防疫背景下大规模体检数据的录入及上传；在患者突发急症及自然灾害等各种紧急状态下，也便于村医向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人员提供上门检查等特殊医疗服务。

项目的创新点

1. 政府、企业、NGO 的共治模式

康宝莱投资建设卫生站的主体结构，当地政府政府配资购置医疗设备，并负责卫生站的后期运营与管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负责项目的落地和执行，这种凝聚政府、企业、NGO 组织多方力量的社会共治模式，将政策导向、社会需求、公益能力和商业资源有机结合，创造多重价值。

2. 发挥企业专长，参与项目设计和执行

康宝莱发挥自身在营养领域的专长，从以下两个方

面参与项目：1) 邀请相关专家录制 10 小时的营养健康课程；2) 康宝莱服务提供商作为志愿者就近到博爱卫生站提供志愿服务，为村民讲解营养膳食和健康知识。

3. 数字化教学，低成本、易复制

培训乡村医生，改善乡村医生的认知和行为能影响到社区的所有人，甚至周边其他村的村民。项目通过数字化工具，开发线上培训课程，降低了培训成本，同时解决了乡村医生工作繁忙，没有整块时间参加线下集中培训的难题。

4. 与国家权威培训相结合，获得专业学分，促进乡医培训参与率

与中华医学会合作开发课程模块，乡村医生培训所得学分均可以申请国家继续教育 II 类学分 5 分，支持进一步进行助理医师资格的申请与考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乡医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营养零饥饿 - 乡村医生项目”自运营以来，获得了服务商、媒体、合作伙伴及受益人的多方肯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赈灾发展部副部长贾鑫表示：“此次基金会与康宝莱共同发起的‘营养零饥饿 - 乡村医生项目’，是跨国企业帮扶乡村基础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典范合作。我们期待更多企业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带动相对落后地区的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保障能力建设，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改善乡村居民的健康素养和生活质量。”

6. 人才振兴类

培养“幸福乡村带头人”

——快手“短视频+直播”助力乡村振兴人才孵化

“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是国内首个关注乡村创业者的互联网企业 CSR 项目，现已发展成为国内首个乡村创业者成长孵化器和乡村产业加速器。

这一项目已在全国发掘超过 100 位有能力的乡村快手用户，通过为乡村创业者（包括农业创业、非遗传承、文旅推广三大领域）提供线上、线下的商业与管理教育资源，培育和提升其领导力及商业管理能力；以及通过提供流量资源、品牌资源，促进带头人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增加当地就业，进而带动贫困人群脱贫。项目到现在已经培育出了格绒卓姆、太平、张飞、马玲敏等一系列正能量网红。



· 来自内蒙古乌拉盖草原的“幸福乡村带头人”太平哥正在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短视频+直播”人才孵化

2021 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这一背景之下，快手将 2018 年成立的“快手扶贫”办公室升级为“快手乡村”，让乡村地区的人们更便捷地记录和分享生活，呈现和发挥所长，从而创造价值，改善生活境遇。快手坚持以赋能乡村为己任，围绕“乡村振兴”“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等多个方面，通过“乡村振兴官”“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福苗计划”等战略项目，助力乡村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快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作中去，先后发起“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乡村振兴官”等项目。快手还与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等多个部委，以及四川、河南和新疆等多地政府，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数百场针对公职人员、地方致富带头人和青年电商从业者



· 2020 年，快手发起县长代言直播带货活动，助力超过 50 位市长及县长在快手直播间出镜，销售当地特产，累计销售超过 3.6 亿元。

等人员的培训。此外，快手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帮扶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共同开展“短视频+直播”的人才孵化行动，探索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三大板块

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主要分为三大板块：

1. 快手幸福乡村创业学院

快手幸福乡村创业学院学制一年，每年三期，主要环节为“集中培训+机构参访+实地调研指导+线上课堂”，旨在全面提升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的短视频创作能力、商业和管理能力，拓宽带头人的产业可持续发展思维，培养乡村新人才，孵化乡村新产业，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实体，辐射带动所在县区贫困农户共同脱贫。

2. 快手幸福乡村说

幸福乡村说是关注乡村发展和乡村创业者的系列演讲活动，旨在打造一个专注乡村发展的分享交流平台。该板块以现场演讲结合快手直播的形式，分享演讲者的智识与经验，启迪乡村振兴的新思路。

3. 带头人互助社区

带头人互助社区是聚合快手乡村振兴人才的交流平台和互动社区。社区成员由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组成，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聚焦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为振兴乡村贡献力量。

幸福乡村带头人故事一

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扶持的江西用户蒋金春，生活在上饶市横峰县，他平时爱模仿鲁智深，也时常扮做许文强。蒋金春通过分享家乡美食和温馨热闹的日常生活，在快手上收获了超过百万粉丝的关注。老铁们被他有趣的段子逗笑，也被他分享的诱人山货吸引，纷纷下单购买山里的特色农产品，如甜茶、笋干等。

2018年，在快手的帮助下，蒋金春共带动当地近200户村民，通过快手销售2000多斤的甜茶、葛根粉，葛根片900多斤，笋干700多斤，葛花茶600多斤，

山茶油400多斤。

这个现象很受横峰县政府重视，县委书记去过他家三次，新华社和江西电视台轮番报道，当地政府为他颁发“最美企业家”，蒋金春成为横峰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如今，当地还专门为蒋金春成立了网红农产品博物院。

幸福乡村带头人故事二

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迷藏卓玛”格绒卓姆，她和丈夫杜沫奎在快手分享最真实质朴的藏族乡村生活日常，采松茸、挖虫草、做糌粑、打酥油茶，还有震撼人心的雪域高原美景，同时把家乡的特产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老铁”。

2018年-2020年，格绒卓姆夫妇通过快手共售出虫草5万多根、松茸7000余斤，还有牦牛肉干、当归、黄芪等多种高原特产，总销售额达500万元以上。他们在养活全家7口人的同时，帮助乡亲们解决了货物滞销困难，用高于收购商5%至10%的价格向大家收购特产，带动了周边多个村庄近百户人家增收，每户年均增收5000元以上。

如今，格绒卓姆夫妇已经注册好“迷藏卓玛”商标，准备进一步发展农特产加工产业，同时，他们正着手修建赤土乡第一家民宿，希望让游客体验到最原汁原味的藏族生活，通过发展旅游，多元、可持续地带动家乡更好发展。

截至2021年，“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共发掘和扶持超过100位乡村创业者，培育出57家乡村企业和合作社，提供超过1200个在地就业岗位，累计带动1万多户群众增收。带头人在地产业全年总产值达5000多万元，产业发展影响覆盖近千万人。

快手在乡村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时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韩长赋在参观快手农交会展区时表示：“快手成为帮助农民朋友脱贫致富的好平台，新快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曾介绍了全国多地的快手乡村新主播故事，由点及面地肯定了快手短视频+直播乡村振兴创新实践。

6. 人才振兴类

乡村带头人走进北大课堂

——新希望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乡村振兴重在人才振兴。村支书、主任是中国最基层治理的带头人，提升他们的思维观念和施政能力，将是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最重要一环。

2021年9月24日下午，由新希望集团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由永好公益基金会和北大国发院“村长工作坊”共同举办的首期乡村振兴“村长班”在北大国发院正式开班。

首批学员由来自四川、江苏、河南等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名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组成。他们中有20多岁的大学生书记、也有扎根基层几十年的老支书；有欠发达地区的村干部带头人，也有安徽凤阳小岗村、四川成都战旗村等先进乡村的负责人。他们希望通过为期5天的学习，助力自己写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村长班”的学员之一严余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的党委副书记，身为带动小岗村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到户”的先进村干部后代，严余山希望能继续发扬父辈们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让小岗村发展得更好。来自黑龙江安达市的王瑞，是本次“村长班”中较年轻的一位学员，他所在的乡村林地多、草原多，养奶牛的多，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发展好现代农业，是他们平时为之苦恼的问题。王瑞通过申请，很幸运地被接收进入到这一次的北大村长班，王瑞希望能开拓眼界，学习到一些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在本次村长班课程的设计者、北大国发院王超教授看来，村长班或者说村长工作坊并不是一场培训，而是一个持续、主动学习的过程。5天的学习过程将会以互动交流为主，课程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大家也将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和答案。这也是行动学习和行动研究的突出特点，即将学习者和实践者主动结合。首期“乡村振兴”村长班设置了丰富的课程内容，有“乡村振兴”政策与法规解读、产业振兴实践分享，还有京郊乡村的案例实

地调研分析等。王超教授会带领“村长学员”们分析研究各自的乡村治理问题，讲授社会问题研究建模的方法，力求提升学员们解决实际问题、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的能力，并会持续跟踪研究大家的真实案例。

新希望为此次乡村振兴“村长班”的发起单位之一，公司创立至今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肉、蛋、奶综合供应商。新希望集团长期扎根三农领域，聚焦民生产业，将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2021年，新希望启动了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五工程”，努力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乡村振兴“村长班”项目就是新希望集团“乡村振兴五五工程”的重要落地举措。

开班仪式上，新希望集团刘永好董事长给学员们上了开班第一课。他表示，能为乡村振兴做什么贡献？如何做贡献？是本期村长班全体参与者共同想要寻找的答案。村长是乡村振兴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和基础，村长强则农村强。未来五年，乡村振兴村长班计划每年举办两次，每年培训100人，五年共培育乡村基层治理者500人。“如果所有的涉农企业，还有一些大企业，都能行动起来为乡村振兴做出一些切实的贡献，那么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就能早日实现。”刘永好说。

乡村振兴重在人才振兴。村支书、主任是中国最基层治理的带头人，提升他们的思维观念和施政能力，将是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最重要一环。新希望集团是我国农牧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北大国发院是国家高端智库的代表，双方都基于“为乡村振兴战略贡献自己的力量”的意愿，共同策划、合作执行乡村振兴“村长班”项目，深入探讨和研究乡村治理新模式，以提升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管理者的工作理念、探寻新方法，并为中国乡村振兴宏观研究提供参考案例。

7. 生态振兴类

在三江源拓展“生态服务型经济”

“老师，麻烦您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动物呢？”

2021年8月的一天晚上，北京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的彭奎博士突然收到了来自三江源囊谦县毛庄乡牧民阿宝的微信语音。随后，彭奎收到了一个用手机翻拍红外相机的短视频。

“这是一只成年的金钱豹！”当彭奎发回信息之后，千里之外的牧民们沸腾了——这是毛庄乡区域用红外相机拍到的第一个金钱豹清晰影像。随后不久，毛庄乡的牧民又发现了成群的马麝、猞猁、白唇鹿、中华鬣羚等各种大型食肉和食草珍稀野生动物，并很快在中国新闻网、青海的电视台、报纸和新媒体广泛报道，这些发现显示了这一地区异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完整的食物链。

牧民们的激动是有原因的：一方面，通过他们的红外相机监测和长期志愿巡护，防止了盗猎偷猎等违法行为，显示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另一方面，这些记录将会在社区的生态驿站——一个由合作社专门为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者而建立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里展示讲解，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毛庄研究、认识和体验这里的自然生态，使社区能够收获生态经济收益。而这些收入的一部分（5%—10%），将按牧民约定比例返回支持志愿者的保护行动。

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绿色发展新范式——“生态服务型经济”在三江源进行的创新尝试。

胜地“女儿国”

玉树囊谦县位于青海三江源澜沧江流域，与西藏昌都接壤，地处青藏高原东部，南接横断山脉，北临高原主体，境内大小山脉纵横交错，峰峦重叠。毛庄乡在县城东南部，下辖塞吾、麻永、孜荣、孜麦、孜多5个村23个社，方圆面积800平方千米。毛庄乡位于澜沧江

源头汇水区，紧邻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西林场保护分区，是典型的高原森林、湿地和草原生态系统，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包括珍稀野生动植物雪豹、金钱豹、林麝、麝鹿、白唇鹿和绿绒蒿等。境内有着广阔的高山草甸草场和有13条大小不一的融雪水沟水源。这些融雪溪流汇聚到毛庄河，最后汇入杂曲河，是澜沧江的重要的源头之一。

“毛庄”意为“妇女的村庄”，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境内拥有玉树地区最大的政教合一寺院之一——苏莽寺，以及江水环抱的古兵家必争之地——尕丁寺，流传着囊谦王国和各部落的许多历史和文化传说。“苏毗女国，胜地毛庄”是这里的名片。

问题源起

但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对脆弱的三江源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毛庄乡也不例外。首先是水源的变化，本区域对气候变化异常敏感，年平均气温的升高带来了冻土融化，冰川退缩。毛庄大小水源水量和水质都正在发生变化，部分溪流干涸；其次，是野生动物盗猎时有发生，外来人的增加使这一现象屡禁不止；再次，河湖湿地和草场的垃圾问题也日渐严重。因为人们消费速食和包装食品越来越多，加上外来务工和游客的增加，日渐增多的塑料制品被随意丢弃在草场、水沟里，给野生动物和上下游人的用水安全带来了极大的环境危害；最后，各种开发利用活动如河道采砂、修建道路和其他基建等，也使栖息地趋于破碎化或水体污染。

本世纪初，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系列生态修复与建设工程。但由于涉及范围广，问题分散，且地方财力有限，对保护区外围的保护往往力不从心。随着环境变化的，还有人心的变化：为了挣更多钱，人们开始热衷于挖虫草、贝母、采砂等，不再那么热爱草原和放牧。挣来的钱进城快速

消费，买车攀比，甚至酗酒、赌博，钱用光了就惹是生非，原本宁静祥和的“女儿国”改变了模样。

这些变化让康巴汉子永强心急火燎。永强原是乡寄宿教师，后改行在毛庄乡政府工作，一度离岗待退在家。眼见几十号人成天无所事事，打架斗殴，做过老师的他认为有责任去改变。

2009年，永强想了一个招：召集30名有不良记录的同乡人员，创办奔康利民环保志愿小组，希望通过捡垃圾、修路桥等活动，改变大家精神状态，教大家行善积德。但由于缺少资金来源，环保活动很快就无法持续。为此，他们又注册成立了奔康利民合作社，希望通过种植挣钱来支持环保活动，还是无所收获。

毛庄乡的妇女素有手工艺编织的传统，受此启发，永强于2013年3月8日这一吉日组织奔康利民合作社成员的家属，共13名妇女，共同发起成立了半边天妇女合作社，既发展产业脱贫致富，还能拿出一部分利润用于环保。永强通过各种努力争取资源，得到县、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但由于缺少技术和设计，妇女们只能制作传统的简单产品，手工也比较粗糙，收益很少，合作社的发展和环保又陷入了停滞。

合作转机

永强带着合作社四处求助，事情终于在2014年有了转机。

一次，青海省林业厅国际合作处张莉处长告诉永强一个消息：来自北京的环境公益机构——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正在三江源开展社区保护工作，可以介绍认识。于是，永强和GEI负责项目的彭奎博士见了面。

“去毛庄试试。”彼时，GEI已经在中国的四川、云南、内蒙古和宁夏开展了近10年的社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其实践的“社区协议保护”模式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肯定，2013年开始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果洛和玉树开展合作，试点以“社区协议保护”为基础的新型生态发展模式——生态服务型经济。

所谓“生态服务型经济”，是以生态保护和维护生态安全为目标，以提高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核心构建的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服务型经济系统围绕提高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运转，通过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产生经济价值，是在政府引导下建立的自我运行系统，主要包括生态服务付费和生态友好型产品两个方面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由政府资助的被动型保护模式不同，生态服务型经济将救助性的补偿变为围绕保护的主动的经济行为，形成各类社会力量为参与主体的积极经济活动，创造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将实现保护与发展的相互激励和自我可持续运转。

于是从2014年起，在青海省林业厅和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指导下，GEI开始与毛庄乡政府和永强的社区合作社合作，将“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型引入毛庄乡，规定各方“权、责、利”：社区以2个合作社为基础与乡政府、GEI签订“保护协议”，授权社区志愿巡护队制定科学保护计划，开展生态保护服务，在保护区外创建生态廊道，守住“绿水青山”；以此为基础，GEI协助社区规划以保护内容和生态文化为基础的生态旅游、自然教育和传统手工艺等绿色经济，通过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实现“金山银山”。模式改变了毛庄乡以前零散的活动状态，其保护和发展开始步入科学化、机制化的道路。

行动方案

根据毛庄乡的实际情况，在社区为主体的讨论决策之下，毛庄乡展开了如下行动方案：

（1）引入“社区协议保护机制”，建立社区协议保护地。省级层面，GEI与三江源国家公园（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引入“社区协议保护机制”；再通过促进社区合作社、毛庄乡政府和GEI签订三方保护协议，规定了各方的权责利，在江西林场保护分区外围划定社区保护地800平方千米，社区按共同制定的计划开展野生动植物监测巡护、水质监测和垃圾清理等保护行动。

（2）合作社组建监测巡护志愿者队伍，开展集体保护行动。社区在GEI的帮助下，组建了40多人的牧民巡护志愿者队伍，开展系统的社区保护活动：1）在“社区协议保护地”内，安装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监测，制定巡护路线，开展定期巡山防止盗猎，对受伤野生动

物进行救助；2）开展水源清洁计划，对4条小流域开展定期的垃圾清理、收集和處理；3）运用科学技术，每年对地表水开展4次水质监测记录；4）对寺庙、村民和学生定期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

（3）赋能社区和合作社，构建生态服务型经济体系。在社区保护协议基础上，联合合作社（包括妇女合作社），结合毛庄乡的传统文化和手工基础，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的设计师志愿者和生态旅游专家，帮助社区设计以手工艺和生态旅游为主要方向的生态经济发展计划；对妇女、合作社员、生态旅游服务者进行设计、制作、管理和商业运营的有计划培训，同时帮助开拓市场，搭建宣传与营销平台；打造围绕毛庄乡的生态旅游驿站、生态帐篷营地和自然体验路线，并引入专业户外公司开展生态旅游商业合作；合作社各产业收益的5%–10%返回支持巡护队的上述生态保护行动。



·毛庄“半边天妇女合作社”工作场景

看得见的效益

社区参与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构建了生态安全屏障。社区通过签订保护协议，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外围增加了800平方千米的“社区保护地”，由地方政府和三江源国家公园授予社区部分的保护权，实际上构建了野生动物植物的生态廊道。经过7年多的工作，社区联合5个合作社，培养形成了50多人的专门巡护志愿者队伍，制定保护计划，开展动物科学监测、日常巡护、水质监测、垃圾清理。通过监测发现了雪豹、金钱豹、中华鬃羚、白唇鹿等珍稀动物，防止了全境野生动物的盗猎行

为；森林破坏行为基本杜绝，高原野生动物遇见率更高；牧民巡护和水质监测成为常态，进行了4年的记录，毛庄村民已经不再向河流湖泊直接倾倒垃圾。社区协议保护地生态服务功能趋于稳定并有较好的提升，形成了保护区外围的生态安全屏障。

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入人心，社区环保意识大大提高。持续例行的牧民生态保护行动和环境教育，不但系统地提升了牧民和僧侣的环保意识和行为，改变了多数人的不环保行为，而且使毛庄乡、囊谦县、玉树州、三江源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等政府机构人员参与学习、培训，增强了社区保护和共管的知识技能。

牧民实现稳定脱贫并开始了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合作社手工艺已经在玉树机场、果洛机场、西宁、北京、上海等地有了产品销售点，产品甚至远销美国等海外，年销售额20–30万，使户均家庭年收入增长了3倍，牧民实现稳定脱贫；生态旅游和自然体验每年为当地带来20万左右收入。

形成社区生态服务经济的新模式。合作社先后对70多位周边社区的妇女、贫困户、残疾人进行手工制作培训，改善弱势群体和妇女地位。根据保护协议，手工合作社每年拿出收益的5%用于支持社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每年1–2万元。毛庄已经成为青海省乃至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脱贫结合的典范，获得县、州、省和国家的诸多荣誉，是“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态服务型经济体系，初步构建了高原社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创新机制。

走向世界的毛庄故事

“一针一线，走出牧区；一带一路，走向世界”，这是2017年带着精湛手工艺和生态保护理念的“半边天妇女合作社”去上海游学打出的标语，如今“女儿国”的人们正在向梦想一步步迈进。

我国中西部保护和发展矛盾冲突非常突出。实施社区保护，发展生态服务型经济，用较小的代价建立生物多样性廊道，并让当地人在保护中持续获得收益，这种模式可以在保护区及周边、国家公园、重要栖息地等广泛适用。



• 毛庄社区努力发展生态旅游

2017年，毛庄社区与GEI合作建立了三江源首个“社区能力建设中心/协议保护基地”，以社区环保人和手工艺人为基础，培训其成为老师，最终独立对外开展社区保护和发展的帮扶和培训。

近年来，合作社的环保人和妇女们开始承接来自政府和各方的委托，目前已对来自青海、四川、云南、新疆、辽宁、内蒙等地社区和保护区的500多个干部和带头人进行了6期综合培训学习。毛庄生态保护和生态经济模式已经扩展到祁连山国家公园等多个保护地及西部8个省份，建立了18万公顷的社区保护地，7.5万人直接受益，为中国西部的生态保护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供了

样板。

更值得高兴的是，2016年起GEI与国内外政府及民间机构合作，在缅甸4个省/邦的27个社区引入生态服务型经济项目，共帮助缅甸保护森林资源21500英亩，推动15683人参与环境保护和发展可持续性生计的活动。2020年又将协议保护落地到印尼的红树林社区和中国-老挝边境社区等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民心相通”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示范。

保护与发展的平衡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2021年，在举世瞩目的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开幕前夕，中国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指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努力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吃生态饭、做生态事，毛庄乡逐渐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兴同步推进、协调发展。”2021年10月9日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我与雪豹做邻居”专题报道，将毛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型案例，带到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在来自全球各地的与会者面前展现。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彭奎博士供稿)

7. 生态振兴类

“两山”理念引领新川村“蝶变” ——村企共建：以工哺农助推乡村振兴的时代样本

新川村，隶属于浙江省长兴县煤山镇，地处苏浙两省交界，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百姓素以卖毛竹、外出务工和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改革开放之后，勤劳的新川人趁政策东风，把握市场机遇，办起了20多家村办企业，更是诞生了中国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军企业——天能集团。

近年来，新川人淘汰落后产业，大力发展绿色新型能源产业，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样板生；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新川人突出村企共建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形成了以新能源高端制造为龙头，配套服务产业协调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经济、精品民宿、农村电商等第三产业有效衔接的特色产业体系。

新川百姓的经济收也随之年年攀升，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45元、1998年的3260元、2004年的2万元、2018年的12万元，上升到2020年的15万元。全村985户居民，就有别墅850多幢，私家轿车1280余辆，轿车户均拥有量1.28辆。

之所以能从过去的落后山区，蝶变为今天的绿色工业园区、富饶生态库区、美丽旅游景区，主要原因就是新川村通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果断关停污染矿山，坚决淘汰落后产业，大力发展绿色新能源产业，在以天能集团为龙头的企业带动下，村企共建搭台，产业发展唱戏，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强村，以工哺农，村企共建，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让绿叶子变成了金票子，实现了党建强、生态优、百姓富、环境美，这再次充分印证了“两山”重要理念的科学性，是“两山”理念转化的又一个绿色样本。

“两山”理念引领新川村高质量发展的蝶变之路

1. 踏上“两山”之路：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拥有独特工业基因和创业精神的新川人把握历史机遇，由“以农为纲”转到“以工补农”，因地制宜，大办企业，一家家社队企业白手起家，无中生有，村里先后创办了金属拉丝厂、金属冶炼厂、炼油厂、竹笋加工厂、服装厂、玻纤厂等20多家村办企业。

1988年，当时年仅24岁的张天任借款5000元，承包了濒临倒闭的村办小厂煤山第一蓄电池厂（也就是现在中国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军企业一天能集团的前身），开始了充满荆棘的创业之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张天任带领团队转型研发动力电池，并成功研发出“电动助力车专用蓄电池”，企业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村办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让村民日益富有，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破坏。新川“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水脏了，山秃了，违章临建林立，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甚至河道里的污水“划根火柴”就能点着。在生态环境倒逼下，守护绿水青山、恢复绿水青山，成为了新川村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选择，2004年新川村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

2. 坚守“两山”之路：产业转型推动绿色发展

选定了生态保护的路，又如何走好发展的路、致富的路？新川村开始上下求索。2004年以来，在生态文明思想理念指引下，新川村积极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一

边“踩‘污染’刹车”，坚决关停污染矿山，淘汰落后产业，以宁可不要发展也要保护好环境的决心和勇气，对“低、小、散”企业进行整治，劝退、淘汰了10多家低小散有污染的企业；一边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对部分保留的耐火材料厂、蓄电池小厂进行重新整合，转型发展，或通过天能集团配套协作，建链补链，形成了以新能源高端制造为龙头，配套服务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产业集群，不断增创绿色发展新优势；或通过立足新川资源特色，发展竹制品加工、精制茶叶等特色产业。

天能集团率先依靠科技转型升级，用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工艺改造提升传统蓄电池产业，从数量、规模的扩张向高端、高质、高效转型。2007年6月11日，天能集团旗下公司天能动力在香港主板上市，成为中国动力电池第一股。2020年1月18日，天能股份在科创板上市。目前集团已发展成为拥有100余家国内全资子公司，3家境外公司，员工2万余名的大型国际化集团公司。

天能集团通过构建“一链一圈”来促进企业绿色增长。“一链”是指绿色“智”造产业链，是从绿色产品、绿色车间、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标准入手，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着力打造绿色“智”造产业链，引领产业向绿色、高端、智能方向发展。“一圈”是指构建行业内领先的循环经济生态圈，通过在全国各地的营销网点，将废旧电池分散回收、集中处置、无害化再生利用，形成了闭环式的循环利用生态圈。

3. 笃定“两山”之路：绿色发展成就美丽乡村

新川村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护好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步伐坚定而有力，新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更漂亮，村民更富有，村风更淳朴。

一是“百姓富”。新川村劳动年龄段近70%的人直接或间接在天能实现就业创业，与天能配套的企业多达十几家，真正实现了龙头企业“一龙带百小”的引领效果。村子里亿万富翁有10多个，千万富翁有上百个，人均年收入在2020年达15万元。村里还有200多户农户在全国各地从事新能源电池销售等绿色服务产业，

既实现了个人创业梦想和全面小康梦想，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带动了全国上百万城乡居民实现高质量就业。

二是“生态美”。新川村以推进精品村建设为抓手，统筹落实道路硬化、路灯亮化、村庄绿化、污水洁化、垃圾分类等各项民生实事，打响了一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家园”的环境整治大会战，实施了景观公园、乡村振兴案例馆、文化大礼堂、幸福之家、供电通信便民设施等多项精品工程，全力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村民也从原来的旁观者甚至反对者，转变为大力支持者并积极参与其中，主动地投入村庄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人公。

三是“产业绿”。在中国新能源龙头企业天能集团的强力带动下，新川形成了以新能源高端制造为龙头，配套服务产业协调发展，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休闲农业、旅游经济、精品民宿等美丽经济有效衔接的特色绿色产业体系，驱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四是“百姓和”。新川村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打造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充分发挥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用。深入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健全完善普法工作组织网络和制度，扎实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活动，建设平安乡村。充分发挥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以诚信村建设为载体，实施“一户一档全覆盖，红榜黑榜全登记，线上线下全公开”，推进乡村诚信体系建设，增强乡村自治和法治的道德底蕴，打造了自治为本、法治为民、德治为根的“三治合一”乡村善治体系。

五是“乡风淳”。红白喜事在村文化礼堂从简办成为村民自觉；孝老爱亲、厚养薄葬、邻里互助、热心公益成了新风尚；村里赌博等不良现象销声匿迹；村里矛盾纠纷由2017年的38起下降至2020年的6起，并且实现了零上访，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被刑事处罚；作为考评指数的垃圾分类，正确率在95%以上。

第六章

乡村振兴企业 投入情况统计

乡村振兴企业投入情况统计

一、银行业扶贫 / 乡村振兴投入情况统计

以下是市值前 20 名的上市银行 2020 年扶贫 / 乡村振兴投入数据列表，数据来源于各银行 2020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开披露的数据。

企业名称	市值 (亿元)		涉农贷款余额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公益扶贫捐赠	
	金额 (亿元)	排名	金额 (亿元)	排名	金额 (亿元)	排名	金额 (亿元)	排名
工商银行	17000	1	数据不详		2006.57	3	3596.6	5
建设银行	15000	2	20888	1	2632.15	2	13200	2
招商银行	13000	3	数据不详		数据不详		13900	1
农业银行	10000	4	12831.70	4	4835.8	1	数据不详	
中国银行	9037.7	5	15185	2	1484.91	4	3700	4
邮储银行	4914.8	6	14100	3	1005.21	5	数据不详	
兴业银行	4034.3	7	4438.99	6	166.68	11	数据不详	
平安银行	3609.5	8	数据不详		数据不详		数据不详	
交通银行	3430.9	9	6313.13	5	334.89	6	4441.45	3
宁波银行	2634.2	10	53.42	14	数据不详		数据不详	
浦发银行	2553.6	11	3548.98	8	130	12	数据不详	
中信银行	2226.5	12	3387.52	9	291.91	7	2393.19	7
光大银行	1842.5	13	3801	7	248.14	8	数据不详	
民生银行	1711.9	14	226.34	13	239.64	10	3526.90	6
上海银行	1026	15	532.42	12	数据不详		数据不详	
北京银行	938.7	16	数据不详		数据不详		数据不详	
南京银行	927.7	17	数据不详		数据不详		数据不详	
江苏银行	893.6	18	1780	10	248	9	数据不详	
华夏银行	874	19	数据不详		8.402222	13	数据不详	
杭州银行	837.3	20	586.28	11	数据不详		数据不详	

二、央企 2020 年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情况

1. 最新公布的 96 家央企名单中，已发布 2020 年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有 65 家；
2. 这 65 家企业中，公布了累计扶贫投入资金的企业有 44 家，公布了 2020 年扶贫投入资金的有 29 家。

三、44 家央企历年累计扶贫资金投入情况

1. 累计扶贫投入资金过 100 亿元的企业有 1 家：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154.96 亿元）

2. 累计扶贫投入资金过 50 亿元的企业有 4 家：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91.13 亿元）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86.4 亿元）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82.48 亿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70 亿元）

3. 累计扶贫投入资金过 10 亿元的有 9 家：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24 亿元）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20.77 亿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19 亿元）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15.6 亿元）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14.48 亿元）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1.6 亿元）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0.75 亿元）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10.711586 亿元）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10 亿元）

4. 累计扶贫投入过亿元的有 19 家

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央企）	累计投入扶贫资金（简介）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十三五”以来，累计投入各类（有偿无偿）扶贫资金 154.96 亿元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扶贫相关累计投入 91.13 亿元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历年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86.4 亿元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司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82.48 亿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1988 年以来，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近 70 亿元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自 1988 年成立以来，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24 亿元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党的十八大以来，投入帮扶资金 20.77 亿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002-2020 年年底捐赠扶贫累计资金 19 亿元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02-2020 年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15.6 亿元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十三五”期间投入帮扶资金 14.48 亿元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累计向 9 县投入扶贫资金 11.6 亿元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累计投入直接帮扶资金 10.75 亿元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2016-2020 年累计在 6 个定点帮扶县、 1 个企业帮扶县投入帮扶资金 107115.86 万元

企业名称（央企）	累计投入扶贫资金（简介）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2018-2020年，定点帮扶资金累计10亿元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十三五”期间，直接扶贫投入9.3亿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5年累计投入帮扶资金7.64亿元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承担了6个国家级贫困市、县的定点扶贫援藏任务，累计投入帮扶资金7.5亿元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2012-2020年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6.55亿元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2002年以来，在“4+2”扶贫县投入扶贫专项捐赠资金超6亿元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定点扶贫资金4.63亿元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2016-2020年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2亿元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十三五”累计投入扶贫资金3.8亿元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8年来，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2.78亿元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016-2020年，在5个定点扶贫区县共投入帮扶资金26660.0万元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2.6亿元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16-2020年，3个定点扶贫县投入扶贫资金2.46亿元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6-2020年向4个定点扶贫县投入无偿帮扶资金2.35亿元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2016-2020年集团下属各单位，累计捐赠1.86亿元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2020年，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7881.3万元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3-2020年，公司向剑川县和民丰县共捐赠资金1.5178亿元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2016-2020年，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3568万元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2002-2020年，集团投入各类帮扶资金1.2亿元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累计投入资金超过亿元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12-2020年累计投入扶贫资金9390万元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2003-2020年累计投入资金6950万元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2020年投入无偿帮扶资金6877.6万元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2-2020年，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近5500万元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自定点扶贫工作开展以来，累计投入扶贫资金5200万元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脱贫攻坚总投入3944.9万元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光集团有限公司]	“十三五”时期，集团累计投入帮扶资金3897万元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2015-2020年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76万元
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十三五”期间，投入帮扶资金1639.01万元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直接投入资金1500多万元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2016年以来，总局累计投入1300多万元

四、29 家央企 2020 年扶贫资金投入情况

1.2020 年扶贫资金投入过亿的企业有 4 家：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3.3 亿元）
-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2.86 亿元）
-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73 亿元）
-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1.695 亿元）

2.2020 年扶贫资金投入超 5000 万的企业有 3 家：

-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9600 万元）
-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5434.6 万元）
-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5363 万元）

3.2020 年扶贫资金投入超 1000 万的企业有 17 家。

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央企)	2020 投入扶贫资金 (万元)	企业名称 (央企)	2020 投入扶贫资金 (万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3300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800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28555	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1537.5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7300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497.76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6950.35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55.3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9600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200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5434.6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100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5363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25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4600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5.89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4003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0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250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975.38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3190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923.46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026.05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	576.5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767.6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7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577.27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50.24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890		

（以上企业扶贫投入资金方面的数据都来源于各企业的 2020 年 CSR 报告，如果企业对相关数据有疑问或补充，可与本白皮书的编撰方联系，电子邮箱：zhangxy@21jingji.com）

发布单位: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乡村振兴研究院、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
报告出品人: 邓红辉
报告统筹: 高山、朱嘉
报告研究及撰写: 张述冠、张雪云
报告设计: 冯荻庚





START YOUR FINANCE



起点财经，网罗天下报告